全球對話

11.1

GLOBAL DIALOGUE

一年出版3期，以多種語言刊出

MAGAZIN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與 S.M. Rodriguez 談社會學

Margaret Abraham

美國：困境與機遇

Peter Evans
Gabor Scheiring
Christopher Muller
Suresh Naidu
Patricia Zavella
J. Mijin Cha
Marcus Anthony Hunter

華裔移民在歐洲

Fanni Beck
Pál Nyíri
Ya-Han Chuang
Emilie Tran
Hélène Le Bail
Stig Thøgersen
Eszter Knyihár
Linda Szabó
Ting Deng
Jelena Gledić
Martina Bofulin

理論觀點

Walden Bello

拉丁美洲的社會學

Esteban Torres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Viviane Brachet-Márquez
Sérgio Costa
Aldo Mascareño
Verónica Gago
Carmen Ilizarbe
Mariana Heredia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議題開講

>《全球對話》波蘭團隊介紹

GD 第11卷 /第1期 / 2021.04
https://globaldialogue.isa-sociology.org/

> 主編的話

在製作本期《全球對話》之時，美國大選正是全球媒體的熱門話題，而我們也知道這導致了後川普時代，但這並不代表美國在過去幾年所目睹的問題不會消失。在「社會學對話」的專題中，Margaret Abraham 採訪了社會學家兼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維權運動者 S.M. Rodriguez。內容深入探討了美國對抗種族主義的歷史，以及在社會不平等和社會正義的交織下，如何激發出這場社會運動。

在選舉前後的戰況之下，Peter Evans 和 Michael Burawoy 針對了美國的處境及可能性發表了我們第一個專題。這些文章是有關於美國「種族資本主義」的歷史觀點，並分析了過去十年中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影響，這包括社會福利減少、勞動階級與有色人種之間具挑戰性的關係、生態問題和氣候變遷，以及在川普的政治引導下產生的慘重後果：在1月的華盛頓發生的那場令人震驚的事件。面對這種困境，作者也在文中探討了要如何才能使改變成真。

我們的第二個專題由 Fanni Beck 和 Pál Nyíri 著筆，文章關注了在歐洲地區的中國移民議題，概述了中國人往歐洲移民的連續浪潮下的歷史和現狀。文章分析了這些移民的情形以及歐洲國家之間複雜的族裔關係，以及他們如何受到中國政治發展的影響，而COVID-19的大流行又是如何影響他們的處境以及他們對移民的論述。

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目睹了極右翼運動、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政黨及政權、經濟危機、未解決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和移民所帶來的新機遇。在理論的部分，Walden Bello將針對全球北方和南方極右翼人士的政治計劃、做法和領導力進行比較。

在這次介紹地區社會學的部分，我們將關注於拉丁美洲的研究。Esteban Torres 整理了一系列的文章，邀請我們在著名研究者對社會理論的學術發展與討論中航行。其中大多數的研究者是拉丁美洲社會科學理事會（CLACSO）中社會理論和拉丁美洲實在（Social Theory and Latin American Reality）工作小組的活躍成員。

在「議題開講」中，為《全球對話》翻譯波蘭語的團隊將要介紹他們的成員，也藉此讓讀者瞭解我們的翻譯合作者們，各自的背景和研究興趣。

最後，我們藉這個機會感謝《全球對話》助理編輯 Christine Schickert對這項重要工作的付出，並歡迎 Walid Ibrahim（來自德國耶拿大學）接任她的職位。■

Brigitte Aulenbacher 和 **Klaus Dörre**，
《全球對話》主編

> *全球對話以多種語言刊出，請至* ISA website.
> 投稿來信寄給 globaldialogue.isa@gmail.com.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GLOBAL DIALOGUE

> 編輯團隊

主編：Brigitte Aulenbacher, Klaus Dörre.

助理主編：Johanna Grubner, Walid Ibrahim.

副主編：Aparna Sundar.

執行主編：Lola Busuttil, August Bagà.

顧問：Michael Burawoy.

媒體顧問：Juan Lejárraga.

編輯顧問：
Sari Hanafi, Geoffrey Pleyers, Filomin Gutierrez, Eloísa Martín, Sawako Shirahase, Izabela Barlinska, Tova Benski, Chih-Jou Jay Chen, Jan Fritz, Koichi Hasegawa, Hiroshi Ishida, Grace Khunou, Allison Loconto, Susan McDaniel, Elina Oinas, Laura Oso Casas, Bandana Purkayastha, Rhoda Reddock, Mounir Saidani, Ayse Saktanber, Celi Scalon, Nazanin Shahrokni.

各國編輯：

阿拉伯：（突尼西亞）Mounir Saidani, Fatima Radhouani, Habib Haj Salem;（阿爾及利亞）Souraya Mouloudji Garroudji;（摩洛哥）Abdelhadi Al Halhouli, Saida Zine;（黎巴嫩）Sari Hanafi.

阿根廷：Magdalena Lemus, Juan Parcio, Martín Urtasun.

孟加拉：Habibul Khondker, Khairul Chowdhury, Mohammad Jasim Uddin, Bijoy Krishna Banik, Sabina Sharmin, Sebak Kumar Saha, Mohammed Jahirul Islam, Abdur Rashid, Sarker Sohel Rana, Juwel Rana, Helal Uddin, Masudur Rahman, B. M. Najmus Sakib, Eashrat Jahan Eyemoon, Shamsul Arefin, Yasmin Sultana, Shahidul Islam, Ekramul Kabir Rana, Saleh Al Mamun, Sharmin Akter Shapla, Ruma Parvin.

巴西：Gustavo Taniguti, Angelo Martins Junior, Andreza Galli, Dmitri Cerboncini Fernandes, Gustavo Dias, José Guirado Neto, Jéssica Mazzini Mendes.

法國／西班牙：Lola Busuttil.

印度：Rashmi Jain, Nidhi Bansal, Sandeep Meel, Pragya Sharma, Manish Yadav.

印尼：Kamanto Sunarto, Hari Nugroho, Lucia Ratih Kusumadewi, Fina Itriyati, Indera Ratna Irawati Pattinasarany, Benedictus Hari Juliawan, Mohamad Shohibuddin, Dominggus Elcid Li, Antonius Ario Seto Hardjana, Diana Teresa Pakasi, Nurul Aini, Geger Riyanto, Aditya Pradana Setiadi.

伊朗：Reyhaneh Javadi, Niayesh Dolati, Abbas Shahrabi, Sayyed Muhamad Mutallebi.

哈薩克：Aigul Zabirova, Bayan Smagambet, Adil Rodionov, Almash Tlespayeva, Kuanysh Tel, Almagul Mussina, Aknur Imankul, Madiyar Aldiyaro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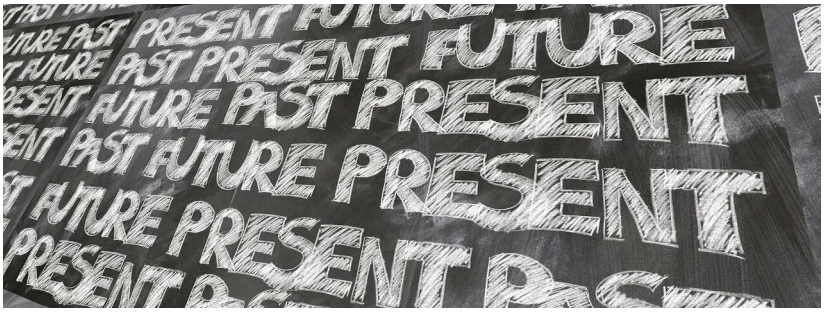
波蘭：Justyna Kościńska, Jonathan Scovil, Sara Herczyńska, Weronika Peek, Aleksandra Wagner, Aleksandra Biernacka, Jakub Barszczewski, Adam Müller, Zofia Penza-Gabler, Iwona Bojadżijewa.

羅馬尼亞：Raluca Popescu, Raisa-Gabriela Zamfirescu, Iulian Gabor, Monica Georgescu, Ioana Ianuș, Bianca Mihăilă, Veronica Oancea, Maria Stoicescu.

俄羅斯：Elena Zdravomyslova, Anastasia Daur.

臺灣：李宛儒, 呂道詠, 洪柏勝, 陳昱嘉, 任軒立, 廖宇雯, 洪崇仁

土耳其：Gül Çorbacıoğlu, Irmak Evren.



在這個主題中，作者們著眼於美國在2020總統大選之後的困境與機遇。文章討論主題納入歷史的觀點，並分析過去十年經濟和政治發展帶來的影響。針對2021年1月發生在華盛頓的事件，作者展望未來，並討論我們能採取什麼措施，使改變得以可能。

此主題針對歐洲華裔移民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一部份文章以20世紀的移民運動為焦點，另一部分則關注21世紀中國移民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變動。

面對如今的全球挑戰，拉丁美洲的社會學理論的重要性正逐漸增加。本主題呈現出廣泛且多元的拉丁美洲理論所具有的獨創性，其有關於全球理論的研究，總能從當地的角度出發。

GD
Global Dialogue 由 SAGE 贊助

> 本期內容

主編的話 2

> 社會學對話

BLM的巧思：採訪S.M. Rodriguez博士
Margaret Abraham，美國 5

> 美國：困境與機遇

還能拿美國怎麼辦？
Peter Evans，美國 9

「絕望之死」與民主的健全：
社會學的挑戰
Gabor Scheiring，義大利 11

人力資本
Christopher Muller 與 Suresh Naidu，美國 14

美國生育正義前瞻
Patricia Zavella，美國 16

為氣候正義而戰，
與拜登、賀錦麗政權
J. Mijin Cha，美國 18

基進補償方案
Marcus Anthony Hunter，美國 20

> 華裔移民在歐洲

在歐華人處境的變遷
Fanni Beck，匈牙利，以及 Pál Nyíri，荷蘭 22

在法華人：從沉默到行動
Ya-Han Chuang，法國，Emilie Tran，香港
以及 Hélène Le Bail，法國 24

中國留學生在歐洲
Stig Thøgersen，丹麥 26

布達佩斯的「黃金簽證」中國移民
Fanni Beck，Eszter Knyihár 以及 Linda Szabó，匈牙利 28

義大利華人：商業與認同
Ting Deng，美國 30

塞爾維亞華人的身份變化
Jelena Gledić，塞爾維亞 32

華裔移民與COVID-19大流行
Martina Bofulin，斯洛維尼亞 34

> 理論觀點

極右政權的比較分析
Walden Bello，美國 36

> 拉丁美洲的社會學

拉丁美洲社會學的普世目標
Esteban Torres，阿根廷 39

世界典範：一個社會學的新提案
Esteban Torres，阿根廷 40

連結全球社會學和全球現代性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巴西 42

將理論歷史化：給拉丁美洲的提案
Viviane Brachet-Márquez，墨西哥 44

相互依賴性的再思考
Sérgio Costa，德國 46

危機的系統理論：忽視的時代
Aldo Mascareño，智利 48

拉丁美洲新自由主義探究
Verónica Gago，阿根廷 50

邁向後自由語法
Carmen Ilizarbe，秘魯 52

拉丁美洲的尺度、不平等及菁英
Mariana Heredia，阿根廷 54

原始積累與法律批判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巴西 56

> 議題開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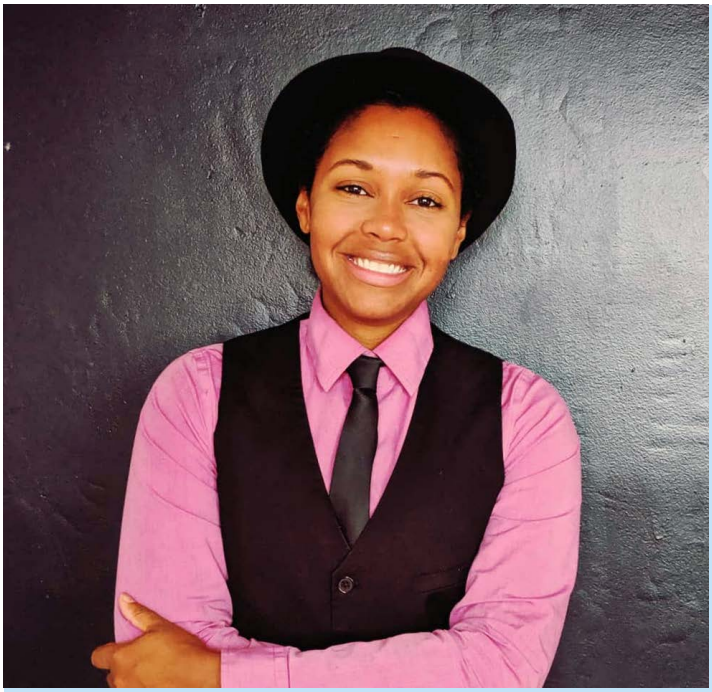
《全球對話》波蘭團隊介紹 58

「歐洲人和北美人視他們的普世性為理所當然，也因此認為自身的特殊性是可以立即普遍地概念化的；拉丁美洲人則因其普遍性受到否定，而必須由其特殊性開始發展。」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 BLM的巧思

採訪 S.M. Rodriguez 博士



S.M. Rodriguez.

S.M. Rodriguez（Samar Rodriguez-Fairplay，訪談簡稱SM）博士是霍夫斯特拉大學（Hofstra University）社會學系犯罪學助理教授，同時兼LGBTQ+ 研究主任。他是《酷兒的經濟：烏干達的LGBTI權利的跨國組織》（2019年）一書的作者，其中Rodriguez 對跨國組織和國際資金對在地運動的影響進行了細緻的分析。他們的出版物包括「牢獄般的保護主義與永久脆弱」、「隱形問題：跨國的非洲同性戀組織和能見度管理」、「將仇恨暴力定罪的解放酷兒替代方案」（即將出版），和「牢房之外：監獄慣習和矯正暴力對獄警的家庭和社區生活的影響」（即將出版）。Rodriguez 正在開展兩個創新的書寫計畫：「學術界的廢奴：學者行動和廢除奴隸制運動」和「標記為廢除運動：紐約的永久殖民性、中產化和廢奴實踐」。在 SOS（the Safe OUTside the System Collective）組織下的社區組織了多年的活動之後，Rodriguez 加入了 Audre Lorde 的董事會，這是美國最大的有色人種酷兒組織。他們的工作得到了各種贊助、獎勵和研究金的支持，其中包括美國大學女性協會（AAUW）的「學術界廢奴」博士後研究金（2020-21）和美國社會學協會的少數民族研究金（2014-15）。

本次，羅德里格斯接受國際社會學協會前任主席兼高級副教務長 **Margaret Abraham**（訪談簡稱MA）以及霍夫斯特拉大學的 Harry H. Wachtel 教授的訪談。

MA：什麼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SM：當人們提到「黑人的命也是命」時，他們通常指的是三種不同但相互關聯的事物。第一種情況是，這是一個始於2013年的全球性組織，在美國、英國和加拿大設有多個分會。該運動的主要目標是打擊白人至上主義，制止針對非裔的國家暴力，以及打造集體權力以維持反種族主義的社會。其次，BLM是一個口號，旨在向世界各地的非裔人民呈現一個事實：我們不僅

>>

存在也至關重要。最後，也許也是最常見的，人們指的是為黑人生命發起的運動（Movement for Black Lives ，簡稱M4BL），這是由許多關心種族正義的組織組成，這些組織在BLM發生前早就存在了。現在媒體報導的趨勢是，無論抗議組織者或參與者背後支持的團體為何，媒體都會立即將所有抗議警察濫用暴力的行動視為BLM。

BLM的巧思之處在於，這是一個所有反種族主義者都可以肯定的口號，這個口號更具有渲染力且傳播更快。Black Lives Matter 是千禧世代的 Black is Beautiful 或 Black Power 的運動：與其說是個運動，不如說是個信仰體系，存在已久的哭訴，和集體的召喚。

MA：您在過去的黑人民權運動和當前的BLM運動之間看到了哪些連續性和改變？挑戰現狀的顛覆性策略有哪些？

SM：在美國，國家社會福利未能完全照顧的人所自組的社群互助已有久遠的歷史。「互助」需要資源共享，並將資源和責任視為整體社群關係的一部分，這種關係不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的上下關係。黑人運動在歷史上數次對國家提出改變的要求，但他們幾乎從未將國家本身視為解決問題的核心。例如黑豹黨的「十點計畫」要求政府補償過去的奴隸制和種族滅絕行為，同時期待由內部社群主導該資源的分配。同樣，BLM運動要求賠償，但不希望這種補償資源的分配工作落入國家職權範圍之內。W.E.B.杜波依斯在《黑人靈魂》提到的有關管理難民和解除奴隸身分人的機構時，指出了國家的局限性。該機構是1870年代專門為保護美國黑人自由和追求有償勞動而成立的聯邦機構，但他在短短7年內就解散，因為它不足以抵抗白人至上主義的暴力（特別是3K黨）和立法將黑人身分視為一種罪惡。

我們可以看到豐富也延續的歷史進程：從對安全、尊嚴和免受政治壓迫的訴求到黑人婦女和LGBT領導階層的出現，以及抗議警方的濫用暴力、國家壓迫、反種族主義的運動和白人賠償/有罪不罰的存在。這些改變十分珍貴。我們看到在某些城市，特別是在中西部的城市，BLM遊行中的許多抗議者常是白人。從歷史上看，這些地區在過去可能只是沒有採取這麼直接的行動。我們還看到軍警和白人至上主義者傷害許多參與BLM的白人，這些白人是BLM盟友！在「自由乘車運動」中，許多白人（包括許多猶太人）因參加民權運動而遭到毆打，這樣的情形和現代支持BLM的白人被毆打沒有甚麼不同，但我未曾聽聞歷史上年長白人被警察壓制、年輕白人女性被輾過以及兩名成年白人被一個白人少年開槍打死。我的意思是，儘管對黑人的壓迫一直都在，但白人盟友遭受同樣的迫害成為新的現實。我認為這種變化顯示國家的壓迫進入新的境界：警方的軍事化不僅大量見於媒體的報導，以警治的精神復興了。

MA：BLM能改變美國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嗎？這種結構性的改變需要付出甚麼代價？

SM：或許我們應該問的是，我們應該如何改變BLM的運作形式？我們應該將BLM視為一個聯合起來的訴求而非只有單一組織和目標的運動。在我的著作中，我探究黑人組織的轉型正義和反暴力組織運作。關注這個主題，不只是為了它的價值，更為其踏實的實作，將BLM運動從口號轉為社會真實。

MA：在BLM運動中性別、種族和階級的交織性是如何呢？

SM：BLM是一個從運動剛開始就是個很好的交織性範例。他是由三位非裔女性所創立，其中兩位是酷兒，這個運動從剛開始就不是只是為了非裔美國人單方面的受苦而發起。過去在這種反抗警察暴力的歷史上較為集中在非裔黑人男性上，這反映了數十年來記憶其實有組織性的聚焦在非裔男性上。我們追悼 Oscar Grant，如同我們知道如何追悼 Philando Castille，我們記得 Amadou Diallo，如同我們懂得追悼 Alfred Olango。這樣以種族化男性為主的敘事，讓我們在追究警察的謀殺責任和過錯時建構一個簡潔的敘事，也相對容易簡化訴求：例如「追究兇手警察」這類敘事。當我們加入黑人酷兒和女性時，會讓意見更為多元以及更多細微差異被看見，這樣的情形是前所未有的。這也意味著當由社群媒體為主的覺醒運動出現時，例如 #SayHerName，對於傷害的發生機率、意義和修復的探討並沒有固定的討論結構。大多數針對黑人女性和酷兒的暴力是因為國家和警察暴力的內化以及使得社群關係弱化。然而，就

>>

是這樣的交織性讓我們在看待轉變時不再是單一目標的視角。這就是 Kimberlé Crenshaw 的理論貢獻：當我們設想且重視那些更為邊緣的群體的需求，我們才能較為全面地介入。

MA：已經有許多討論和辯論關於削減警察部門的預算，BLM是如何帶起對於刑事司法改革的運動呢?

SM：這種對於社會改革的提議總是遭受相同的論述宿命：下猛藥才會引來最多關注。這種直接拿走他們資源的手段聽起來激烈，造成恐懼，這就做負相改變。而正向的政治—創造的—帶來驚奇。削減警察部門的預算的聲音具有許多意義：這是一個包裹在三字口號中的豐富又細緻的提議。在許多層面來說，社會學家應該對此感到深厚興趣，因為這樣的運動策略曾由美國社會學鼻祖之一的 W.E.B. Du Bois 在1935年的著作「廢奴民主」中闡述過：他主張我們要創造出新的運動模式，否則無法影響廢奴的運動。我們必須投注時間精力來打造肯認黑人生命的機構來取代結構性的奴役。這樣才能在反抗後有直接的機構來取代舊有的，否則舊有的勢力會再演化。現代的社會運動領袖不僅提出甚麼應該在體制中被抹除，還主張應該要介入什麼樣的新行動。

MA：媒體形塑的BLM如何影響種族正義的組織形成?

SM：有趣的是，我發現在川普時代這種白人國族過度展現的時候，媒體對黑人抗議的行動報導是站在比較同情的立場。主流媒體推動了一種虛構式敘事，Achille Mbembe 稱作「被創造的危機」，來支持黑人生死的緊急狀態，儘管迫害黑人和國家暴力持續，過去那種看起來不具正當性的訴求現在都合理了起來。

在我的著作「酷兒的經濟」中，我已經提過媒體的關注度雖在更進一步釐清問題上幫助有限，但能提高外界的資金投注。圖像越轟動和激烈，獲得的支持就越多。但是，由此而獲得的支持很大程度上仍是膚淺的，參與度隨著時間下降。媒體的報導造成大量關注但最終引發運動的巨大財物損失。許多個人捐助者和基金會都掌握了慈善捐贈的管道，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自己的形象。媒體創造了運動的文化聲望基礎和最新的關注資訊。在我先前的作品中提到，烏干達的《反同性戀法案》和這種資金流動實際上會帶來意想不到的後果。今年夏天，我以一個種族正義組織的董事會成員名義發言，BLM運動意味著種族正義倡議正在發生，當人們在設想該政治危機時，也無法想像會經歷一個類似的財務紅利。

MA：BLM的進步主義是如何影響美國的選舉和政黨政治?

SM：黑人進步主義雖然在選舉時是邊緣議題，但總是影響著主流政治。例如黑豹黨的免費早餐計劃，該計劃在1960年代成為政治核心，並於1975年在美國公立學校廣泛實施。今年總統大選有相似的情形，黑人進步主義運動倡議優先考慮對過去的奴隸制進行賠償，提出四個民主社會主義倡議：全民醫療保健、取消學貸、進入公立大學以及削減軍隊和警務預算，以投資於社區資源（如日托、公立學校和社福機構等等）。再次，我們看到黑人進步主義者沒有得到理想上的左派支持，反而是一位民主黨候選人不願在總統初選辯論中就奴役非裔美國人獲得賠償的可能性進行討論。然而，歷史顯示黑人進步主義的主張是能裨益美國整體的。

MA：社會學家已經挑戰許多我們的思考模式和做社會學的方式。有哪些社會學者影響你思考BLM運動呢?

SM：社會學家長期以來對「全控機制」進行了批評，而植根於這種批評的學者組織起來使社會擺脫這些標籤、監視和懲罰。在我目前的書寫計畫〈學術廢奴〉中，這些學者都採用身為廢奴主義者的語言和身份來書寫。

我想先讚譽 Mariame Kaba 的學術成果。她一直是廢奴主義思想和實踐的重要學者，她的學位是社會學。專門在高等教育機構中的社會學家的工作是一回事，而看見社會學如何實踐是另一回事。Kaba 一直影響著芝加哥的BLM發展軌跡，並為為黑人生命運動做出了許多貢獻，其中包括黑人青年計畫（Black Youth Project 100）。

許多學術工作的積極運動者極大地影響了我的觀點和工作，包括 INCITE! 這個組織的

>>

2020年6月14日星期日，在紐約布魯克林大陸軍廣場，加勒比人領導的「黑人的命也是命」集會。來源：Margaret Abrah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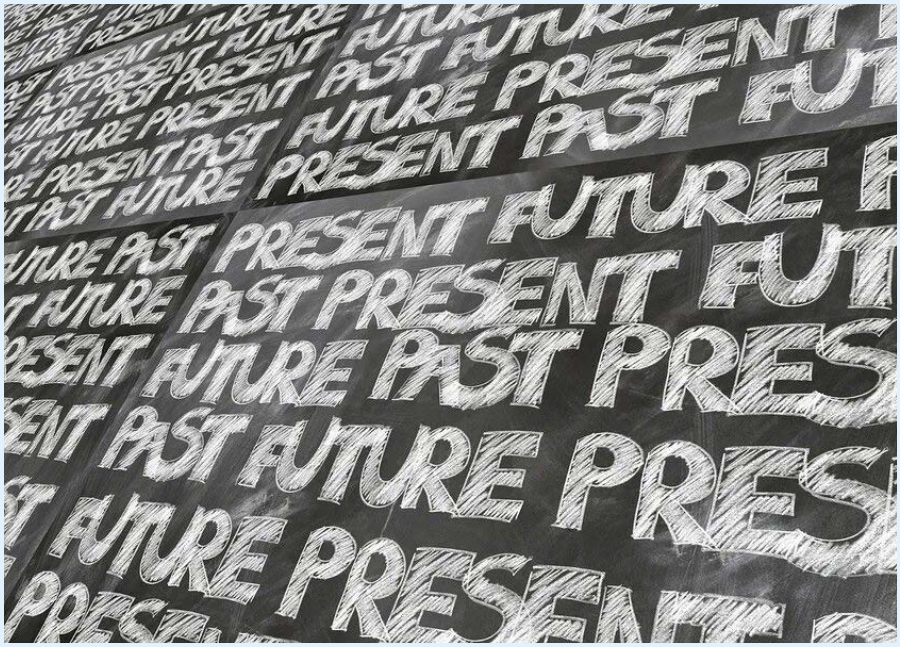
創始成員 Beth Richie，還有創意介入的創始人 Mimi Kim 和 Liat Ben-Moshe，他們讓我們在運動和學術研究中，將身心障礙者置於分析的焦點。我認為這三位女性確實處於知識創新和中止監禁的行動先鋒。

在美國以外的地區，我的靈感來自德國的 Vanessa Eileen Thompson 和烏干達的 Sylvia Tamale。Thompson 說明了社運份子採用的抵抗科技來中止反黑人和反移民在德國和法國的國家暴力。女權運動者 Tamale 致力於倡導性別和性正義數十年，同時與公眾合作以改變暴力文化。■

來信寄至：
<sm.rodriguez@hofstra.edu>
或是
www.smrodriguez.com

> 還能拿美國怎麼辦？

Peter Evan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美國，ISA經濟與社會研究委員會（RC02）、勞工運動（RC44）和社會階層與社會運動（RC47）的成員



在分析美國過去四年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有必要展望它的未來和可能。來源：創用CC。

自二十世紀中葉以來，美國已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發展的指標象徵。現在，美國仍然是資本主義全球發展的先驅嗎？如果是的話，21世紀的美國資本主義未能維持其工人階級在20世紀時的福利標準，這部份失敗的政治後果，將會對世界所有公民產生影響。

要去解讀美國混亂的進入21世紀的源起和影響是一項分析性的挑戰。以下五篇文章是回應此一挑戰所做的努力，有著簡明扼要的分析、著重於美國政治經濟的特定領域、並探討美國政府失能的問題。儘管他們稱不上是全面性的概述，但也算是富有洞察力和批判性的分析，這些分析對於未來生活在美國（或在美國陰影下生活）的人所可能受影響的相關議題，提供豐富的討論基礎。

Gabor Scheiring 的討論從一項美國幸福感下降的指標開始—許多沒有大學學歷的白人工人因「絕望而死」而使得死亡率上升。因市場趨動造成工人階級的生計和社區的破壞所導致的絕望死亡，促使工人階級支持右翼民粹政治。

白人工人階級因「絕望而死」也是 Christopher Muller 和 Suresh Naidu 研究指出的顯著徵狀，但 Muller 和 Naidu 認為這是因學歷所產生的社會排除和剝削，進而產生政治鴻溝。通過大幅降低就學成本來擴大獲得大學學歷的途徑可能有助於彌合鴻溝，但他們認為，建立跨越學歷鴻溝的有效聯盟更為重要。穆勒和奈杜認為此類型聯盟的建立將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左派的責任，例如，這些左派成員應該要將自己所學貢獻在幫助工人階級組織，例如工會。

Pat Zavella 文章的書寫主題由工人階級生活世界的破壞，轉移到貧窮有色人種的女性移民的持續鬥爭上。與謝林的論點（國家是新自由主義的幫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扎維拉認為國家對女性生育權的壓迫是對這些女性的生活和家庭的核心威脅。然而，對抗國家

>>

而非對抗整個資本體制可能有助於女性組織抵抗運動。對於扎維拉而言，爭取生育正義的核心來自於有色人種女性所領導的社會運動之間的廣泛合作，過去在抵制保守派上已贏得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勝利，她們在與拜登政府的對抗中也同樣全力以赴。

走向低碳社會的過渡期通常被視為技術官僚所需面對的問題，但 Cha Mijin 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具包容性的將工人階級的組織和有色人種社群整合起來，是邁向低碳社會成功的關鍵。爭取氣候正義的鬥爭需要建立合作聯盟—「創造高品質的工作與減少碳排放是不可分的」，而且在政策上必須照顧到被迫受化石燃料排放污染的有色人種社群。在思考減碳排放時如果忽略對社會和經濟層面的考量，這樣的策略不僅有失公平，也難以聯合廣泛的支持來對抗化石燃料帶來的經濟誘因。

Marcus Hunter 撰寫的文章是五篇中的最後一篇，結合了深厚的歷史深度和對解決方案的全面願景，從在美國資本主義形成過程扮演重要角色的奴隸制著手，亨特強調要改正400年來種族資本主義中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社會、文化和經濟不平等現象所需的重要轉變。然而，亨特提倡的多層面賠償計劃並非僅僅是一種理論上的表述，而是從非常具體的提案開始，例如國家真相委員會、種族傷害治療和轉型（TRHT）委員會的立法。

這五篇文章在分析角度和焦點上雖有不同，但它們在判斷美國種族問題和確立前進方向上有共同的主題。

川普政策的破壞性影響是這些分析家的共識。2021年1月川普支持者對國會大廈的攻擊顯示，川普有能力激發白人工人階級的憤怒，但也揭露了美國政治失能的問題。早在一月攻擊國會大廈事件發生之前，Scheiring 的文章就指出，新自由主義數十年來對工人階級生活帶來的破壞，未能得到修復；也因此，他認為川普主義的崛起很可能只是一連串傷害民主的政治運動的序幕。

不管COVID疫苗接種或新上任的總統都不能解決這裡提出的問題。這些作者提出的策略主要是探究21世紀美國政治功能失調的結構性根源，儘管在華盛頓已建立了新的政府，但這些問題仍將繼續存在。Zavella 得出的結論是，拜登的當選並不會改變未來仍有許多艱苦的困難這一事實。Cha 則堅信拜登政府領導下的綠色新政似乎前景黯淡。

那些對美國的未來感到焦慮的人，並不會因為拜登的當選而鬆一口氣。對於自己提出的建議，這些作者都沒有給出足以說服我們的結構性因素。他們也都沒有指出，有一股強大的政治力量正在聚集，試圖對抗美國經濟和政體的衰落。對於那些尋求安慰的人來說，並沒有任何跡象能讓人樂觀地看待未來。

然而，我也不會在這邊作出末日的預言。這些分析並不僅止於指出問題所在，還設想出了一系列創新的、促進變革的方法。以美國最深層的結構性問題——種族主義為關注對象的 Hunter，也提出了非常樂觀的看法：他認為「承認和保存真相，並有意義地修復受創傷的種族群體，可以為美國帶來轉型」。他的每篇文章，都指出了政治勢力有可能在漸進式變革中起作用。他認為在國家的層次做變革已經沒有希望，且應該將重點放在較小規模的具體目標。Cha 以州層級組織成功的氣候正義聯盟為例，尤其是那些包括工人階級的組織。Zavella 則直接關注跨性別、種族和階級認同的聯盟，認為他們是進步能量的核心。對於 Muller 和 Naidu 而言，關鍵是受過教育的左派人士，在幫助建立、維持工人組織尚有多少意願。Scheiring 斷言，就連社會學家在這件事情上也能扮演重要的角色，其能夠分析經濟蕭條與勞工白人的「絕望之死」之間的複雜因果路徑，以及絕望如何被與政治連結。

儘管關注的領域截然不同，但作者們指認出了不同的行動者，他們在不同的領域中取得成功，而其成功相互交疊，並擴大了在其他領域進行變革的可能。這些行動者的組合提供了一套特殊的、相互交織的行動計劃；其並非有確切行動方針的藍圖，而是關於我們「可以做什麼」的部分草稿。■

來信寄至：
Peter Evans <pevans@berkeley.edu>

>「絕望之死」與民主的健全：社會學的挑戰

Gabor Scheiring，Bocconi University，義大利，ISA經濟與社會（RC02）、社會變遷與發展社會學（RC09）、健康社會學（RC15）、政治社會學（RC18）等研究委員會成員

自世紀之交以來，美國中年人的死亡率一直在上升。這一死亡浪潮的三個直接原因是自殺、吸毒過量和與酒精有關的死亡——所謂的「絕望的死亡」。
來源：創用CC。

新冠病毒的流行暫時減緩了民粹主義的崛起，並為政治局勢卸下不少壓力，也有助拜登在2020年獲選總統。然而川普帶來的影響並不僅限於白宮，川普主義以及國族民粹主義，也顯示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生存危機。如果拜登政府未能解決潛在的緊張社會局勢和經濟動盪，或是受到共和黨阻

>>

礙政策進行，那麼第二波的國族民粹主義浪潮將勢在難免，甚至可能有另一波更糟的川普主義回歸。在此情況下，社會學應以政治為關注對象。

民粹主義試圖建立與非菁英人士的直接連結，並利用此連結反對政治菁英。有時這種方式可以推進政治資源重新分配，打擊根深蒂固的特權階層。不過在其他情況下，民粹主義可能提倡反動或保守的議程，並聲稱其利益以社會大眾為對象，卻以社會中的少數群體為受眾；其對「菁英」的打擊，通常也並未針對真正的經濟特權階級，反而加深了這種不平等。當前的民粹主義浪潮，則屬於第二類：反動的右翼民粹主義。本文中民粹主義的意涵即在於此。

政治學家提供了針對當前民粹主義浪潮的學術論述。他們的專長在於分析選民的態度和政客的手段。要理解民粹主義，了解其政治上的戰略——如何擊破自由民主制度所建立的社會形式與機構——顯然是至關重要的，畢竟民粹主義政治家並不是在一個真空的社會中運作。也有些人強調反自由文化的態度，這些態度決定了民粹主義的政治訴求。但是，民粹主義不僅僅是種族主義。將民粹主義者的選民視為種族主義者，會使自由主義者忽略工人階級社群的政治結構，這是一個致命的政治錯誤。

與政治學相反的是，社會學在至今以來的民粹主義論辯中，一直扮演著較為邊緣的角色。 社會學家強調的是經濟變化——包含全球化、去工業化以及朝向高技術密集工作的轉變——如何改變了傳統的選舉結盟對象。這些選舉結構的改變破壞了社會民主黨的選舉基礎，並促使工人階級選民向右派轉移。其他學者則表明，當左派在社會和經濟政策上向右傾斜時，民粹主義的右派將會獲勝。對於此現象，質性社會學家與民族誌學者則提及數十年來的新自由主義如何對日常生活和工人階級社群造成嚴重破壞，最終削減了階級認同、為國族主義動員打下基礎。

有趣的是，作為資本主義存在危機的表徵，鐵銹帶工人預期壽命下降，以及隨之而來的健康不平等加劇現象，至今仍未引起多數社會學家的關注。這類「絕望之死」的震撼案例不只在美國發生，在世界其他地區，如英國和東歐國家，工人階級的死亡率和健康不平等也在不斷增加。

在20世紀大部分時間裡，美國和歐洲的預期壽命一直在增加，這是醫療保健、福利國家和經濟增長的發展所帶來的好處。然而，當今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正在經歷一種完全不同的趨勢，這使得美國成長模式備受質疑。自千禧年以來，美國中年白人的死亡率一直在增加。美國黑人工人在三十年前經歷了類似的危機，因為第一批大規模關閉的工廠對城市社群造成了嚴重破壞。正如普林斯頓大學的兩位經濟學家 Anne Case 和 Angus Deaton 在書中強調的那樣，絕望之死在2017年殺死了158,000名美國人，相當於一年中每天都有一架載滿乘客的波音737墜機。

在美國，這幾波死亡的三個直接原因是自殺、藥物過量和與酒精相關的死亡。這就是 Case 和 Deaton 所說的絕望之死。它們反映出人們對未來的感覺和對自己生命的價值。絕望之死呈現不均勻的社會分布。絕望之死人數的增加僅限於沒有大學學位的工人，而社會變遷的混亂是導致這種情形的重要原因。

失去穩定的工業工作已經深刻地改變了工人階級的社區，並使其文化瓦解。製造業和服務業的新工作往往更加不穩定，且有更多的臨時工，自顧者人數也出現上升。冰冷的商業公司策略、缺乏集體的組織力量以及被資本鉗制的國家是這一轉變的核心。過去構成藍領工人骨幹的城鎮如今已成為社會、經濟和健康問題不斷惡化的絕望的家園。美國鐵銹帶的去工業化推動了工人階級的瓦解，並導致了嚴重的社會心理壓力和絕望情緒的上升。這種環境是情緒和精神問題增多的基礎，隨著時間的推移，情緒和精神問題通常會轉化為其他健康問題和酒精或藥物上癮。

儘管 Case 和 Deaton 對絕望的死亡人數進行了開創性的調查，但經濟學的學科限制侷限了他們的分析。他們支持社會學者關於去工業化帶來不利社會後果的文獻，強調經濟轉型帶來的去工業是健康不平等的決定因素。但是，他們沒有繼續深入這些機制的複雜性，並得出必要的理論和政策結論，而是強調美國經驗的特殊性，並論斷必須以管制藥物和建立真正的自由競爭市場來作為解決之道（Case and Deaton, 2020）。

在美國預期壽命下降的前幾年，東歐經歷了類似的死亡率上升情形，這樣的規模在已開發國家的和平時期是空前的情況。在1990–99年，光是

>>

俄羅斯就有326萬人死亡。後社會主義時期的死亡率危機——我的博士學位論文以及隨後的幾篇期刊文章的主題——也與東歐的工業和就業結構迅速變化有關。在匈牙利的後社會主義死亡率上升期間，去工業化可能造成了三分之一的失業男性死亡，而跨國公司所帶來的經濟利益並未轉化為健康狀況的改善。俄羅斯的數據也證實了由去工業化和大規模私有化造成的經濟轉型所帶來負面的社會心理影響。然而，自1990後半以來東歐的預期壽命又開始增加。美國白人工人階級的預期壽命則相反地下降了二十年。

人的健康和民主的健全是交織在一起的。那些在受疾病困擾地區的人們以及面臨工作不穩定和負向動力的工人，更傾向於支持民粹主義。川普在美國那些人民健康地區低落的受歡迎程度、英國脫歐投票在受財政緊縮打擊且健康低落的地區受到較高的支持，以及 Lega Nord 在義大利去工業化小鎮的工人中得到較高支持的情況，都是經典的例子。

即使如此，那些政治強人仍向選民保證，他們將拿回自己國家的控制權、就會有更好的未來，雖然這樣只是讓那些已經受害的群體處境更加艱難。政治菁英才是這種脫歐和川普的新自由主義變種出的國族民粹主義得利者。即使這樣的不平等長遠來看破壞了經濟發展，但重分配可以在短期內促進增長。因此，國族民粹主義者還是可以吸引支持民族主義的資產階級、外國投資者和中上層階級的支持。

民粹主義者並非當今多重危機的根本原因。他們只是在利用既有的經濟結構帶來的危機，以提供自己政治機會的政治企業家。社會學在分析這些潛在的經濟結構轉型上，具有巨大的潛力，正如《全球對話》的分析所強調的，社會學觀點可以為分析民粹主義帶來的好處。

目前有許多的中間派政黨緊守著政治現狀，不過這並不足以阻止現在的民粹主義浪潮，也難以修補經濟結構轉型所帶來的「絕望之死」問題。現存的人口或民主方面的問題需要深遠的改革。透過其分析，社會學家其實有很大的力量，能夠去分析這些工業化改變後的問題，找出複雜的因果關係、找出那些身受工業發展轉型而健康受害的人與民粹主義間的機制，並且能夠補足經濟學家和科學家的分析。民主的健全和人民的健康是相互依賴的。■

來信寄至：
Gabor Scheiring <gabor@gaborscheiring.com>

參考文獻

Case A and Deaton A (2020) *Deaths of Despair and the Future of Capitalis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人力資本

Christopher Muller，University of California，柏克萊，美國以及 **Suresh Naidu**，Columbia University，美國

Arbu 繪。

在極端的財富分配和收入不平等的情況下，COVID-19破壞經濟的現況似乎為革命形勢配齊了最完美的條件。考慮到社會動員理論中最機械式的經濟決定論：高度的結構性不平等加上短暫的經濟衝擊和已經衰弱的國家能力，這些應轉化為國家危機和潛在的政權更迭。至少，這樣的理論可以預測 Bernie Sanders 將贏得壓倒性的勝利，因為美國的工人階級能夠聚集到他以重新分配為論點的舞台上。

但是相反地，我們在政治上一直處於僵持的狀態，這很可能會導致國家進一步癱瘓。在未來2020年的大選上，我們可以預見驗屍的人數將會大大增加。但是在這種背景下迫近的現實是，世界各地的教育形式仍是左派得票數，甚至是左派激進主義最有力的預測指標。我們應該如何理解Piketty的商人右派（Merchant Right）與婆羅門左派（Brahmin Left）之間的分裂？這是否意味著必須放棄唯物主義式的政治分析方法？我們可不這麼認為。但是，可能需要透過以學歷建立的排他性、剝削所產生的社會分化，進行更仔細的分析以補充上述之不足。

思考一下這兩點。

首先，至少從1960年代開始，大學就成為了一個從制度上再現左派思想的重要場所。保守派就對此感到哀悼，當我們面臨氣候災難並盡可能避開流行疾病之時，令人驚訝的是，竟然有許多人為了畸形的校園政治而堅守著夜晚。但是毫無疑問地，大學以及大多數的文化產業都被民主黨的忠實支持者徹底佔領了。在研究社會領域的部門中，沒有比這更真實的了：甚至公認是保守學科的經濟學教授也以4:1的比例傾向於民主黨（社會學則是44:1的比例）。而從大學繼承政治的不只是中間派民主黨的支持者，也有許多左派人士。

第二點，自1970年代以來，那些沒有從大學畢業的人，他們的財產無論從絕對意義上或是相對意義上都在減少。從1970年代末到2000年，大學保費穩定增長。如今，即使學生的債務危機和2009年的經濟衰退危及了一代受過大學教育的年輕人，但沒有從大學畢業的代價仍舊無法質疑，在以下的發現中就能夠明顯地看出這一點：在Anne Case和Angus Deaton的記錄中，沒有拿到學士學位的人死亡率驚人地上升。甚至是私營部門的工會，即工人階級組織的原型，也被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所佔據，而大多數的低薪工人依舊難以達到工會化。

>>

通常這兩點我們會分開討論，但若將它們放在一起思考會很有幫助。藉由這樣的思考方式，我們可以發現大學逐漸說服了他們的畢業生，諸如全球財富稅或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等穩健的思想，但也同時拓寬了他們與我們廣大選民之間的社會、經濟以及言辭上的隔閡。

而企圖爭取人們支持的社會運動也因為這種隔閡形成了僵局。再現的左派勢力復甦了網路上的公共廣場，為主流媒體帶來了重塑社會的強大思想，這種思想在幾年前甚至還不被人們重視。但是，儘管左派與中心之間、或左派內部在網路上的辯論很重要，但這些爭論完全是有大學生學歷的人內部進行的交流。這表示1982年後出生但沒有大學學歷，這些約60%的人並沒有對社會有太大的關注。而這些沒有大學學歷的人，通常生活重心都圍繞於家庭、教堂或是社區中心，他們對社會的關心和行動僅僅關乎於那些試圖將他們引導到政策需求的作家世界。

顯而易見，如果要縮小收入跟財富的不平等，就需要縮小有無大學學歷的人之間的經濟鴻溝。雖然沒什麼成效，但卻可能很重要的就是要同時縮小社會鴻溝；接著要跨越教育界限，在受過大學教育的左派和未經大學教育的人之間建立社交網絡，將這些網絡轉變為由工人階級領導的組織，但我們該怎麼做呢？

其中一種策略是增加人們讀大學的機會，降低讀大學的財務開銷和大學教育的私人收益。大學要為左派做的事，就像軍隊為右派做的事那樣，右派就以這一事實為理由要求大學退款。藉此，我們就有理由要求開放給所有人的免費大學教育，以及為高等教育和基礎科學研究提供更多的公共資金。但另一方面，也由於大學教育的投資報酬取決於其稀少性，所以這將縮小有無大學學歷的人之間的經濟差距。但即使壓縮了大學學費和參與成本，仍會有一大部分的人不想上大學，這樣教育鴻溝上的交流分歧依然會存在。

另一種策略則是改變我們言詞交談的方式，減少與那些在政治上跟我們想法相近的人爭論理念上的小分歧；增加關注那些強調根本意義觀點、與我們理念相差甚遠的人。當然，其中一個作用是使我們的思想更容易被廣大聽眾所接受，展示出能吸引人們去服務社會的道德觀念；並指出能夠吸引人們更進一步地參與政治和關心社會的道德、慈善觀念之間的關係。但是即使我們廣泛地傳播這些思想，也頂多只能做到目前的程度，像是能用對話反映意見或分享參考資料的社交網絡，人們可以在不隸屬於其中一員的情況下就能聽到一個想法或得到一項資訊。Sanders 的溝通方式並非是缺乏管道、難以觸及的，然而，只有當移民、工人和移民工組成的組織，在其會員的網絡中響應這些訊息時，這樣的溝通機制才能真正發揮作用。

因此，前兩種策略只有在能夠有利於建立、維持工人階級「組織」的情況下才可能有效。受過大學教育的左派人士有辦法發揮作用嗎？其中一個辦法或許是建立畢業生和搖搖欲墜的學術界以及科技、媒體工作者的工會，使知識分子的派系融入勞工運動；另一個辦法則是擴大工會和其他組織裡「家庭知識分子」的人數和影響範圍，使這些組織裡的人可以在大學外追求知識性的生活，而不受專業性壓力和學術偏見的影響。在過去，這類知識分子的工作通常是戰略性的，但將來也有可能越來越具有科技性。有些人可能會使用他們從大學中學到的技術來強化組織裡的法律、技術和行政管理能力；有些人則可能會用實驗性社會科學下的工具來打造組織系統，就像麻省理工學院的貧困行動實驗室（MIT's Poverty Action Lab）中以贊助為主的開發模式一樣。舉例來說，當代工會就是一種需要軟件基礎架構、分析的數據驅動組織，而這些技術通常只能由擁有專門技能的人員組織和執行。這種行動可以以運動律師為原型，在運動律師的原則中，是讓受過大學教育的左派分子為無學歷人士所經營的組織工作。

為了吸引受過大學教育的左派人士對超越階級的議題產生興趣，似乎有必要將這三種策略結合起來：第一，努力提升大學入學率；第二，改變左派人士的文化和言辭方式，以包容各種推論方式在個人背景上的差異（也許可以透過執行公開的尊重準則達到這點）；第三，放棄組織中事實上應對美國工人階級負責，卻由基金會、政府和以贊助為主的組織佔據的部分。■

來信寄至：
Christopher Muller <cmuller@berkeley.edu>
Suresh Naidu <suresh.naidu@gmail.com>

> 美國生育正義前瞻

Patricia Zavell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美國

川普執政期間，美國各地舉行了眾多抗議和反對墮胎禁令和限制的集會，這是其中之一。
來源：flickr。保留部分權利。

生育治理是川普的政策核心之一，其試圖監視、控制女性的生育行為，也藉由反墮胎論述，迎合福音派基督教徒等支持者的立場。在移民議題上，川普政府也呈現出與面對生育正義時相似的政治及意識型態；他將移民描述為對美國國家安全、經濟、身份認同的威脅，更指稱這些人「不配」享有特定權利，並在政策的引領下推動了前所未有、違背法治精神的議程。

生育政策和移民政策皆以有色人種女性為主要對象，顯示兩者之間是互相連結的。除此之外，川普面對COVID-19的無能，更造成大量人員死亡。受到限制的有色人種與移民，只能選擇在較危險的前線工作、住在擁擠的家裡，成為這場疫情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是生育正義議題的焦點之一，這項法案使女性更容易取得避孕、癌症檢查和產前護理等預防性的醫療資源；卻受到反對方大力反彈，甚至堆動廢除法案。雖然川普沒有順利廢除這項法案，他仍然成功地在許多方面，剝奪女性取用生育醫療的權利，例如廢除了 Title X 計畫，這項補助計畫為四千三百萬名國內外的低收入女性提供醫療服務。此外，川普政府還資助提倡禁慾的青少年懷孕預防方案、默許醫療人員歧視LGBTQ病患、指派了將近兩百名可能危及女性墮胎權利的下級法院法官，以及三名最高法官。

政府當局在打擊有色移民上，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在史無前例的限制性移民議程下，川普將拉丁族群妖魔化，並實行了超過四百項政策變革，包含：禁止穆斯林國家的旅遊人口；將難民的通行人數減至1980年以來的最低數量；結束來自十個國家、四十萬名難民的收容；設立更難通過的合法永久居留權與公民權門檻；規定移民不得在通過邊境以外的情況下申請庇護；以家庭與幫派暴力作為庇護所的核心；進行庇護申請者的計數，強迫他們在收到通知前待在墨西哥；進一步限制移民獲取福利的權利，如取得食品券的資格。川普政府的「零容忍」政策使數以千計的兒童與父母親分離，拘留的處境更導致孩童照顧的忽視，甚至虐待、死亡。這些情況尤其發生在少數族群與跨性別的移民，以及被驅逐出境的移民身上，也使他們面臨COVID-19與其他生命威脅。移民女性受到官僚主義的壓迫，在拘留期間被迫絕育、甚至不能合法地墮胎。

>>

對於低收入女性，特別是有色人種女性而言，反生育正義以及反移民立場的政策，為她們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這些政策賦予特定州區反對墮胎的權利，而全美國有六成的女性生活在這些州區。黑人女性與少數族群女性的產婦死亡率顯著增加，反映著反對派在打擊生育正義上的成果；那些因身份資格未被授權而遭到限制的女性，對於要求食品券等公共福利，或是尋求產前護理、避孕等醫療服務感到恐懼；同時，LGBTQ族群也在健保制度中面臨歧視。

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種的女性，也不斷嘗試反抗這些壓迫。他們公開反對川普針對弱勢族群在各方面的壓迫；廣大的倡議團體也時常集結，共同對那些反動的政策與作為發起挑戰，並推動更進步的立法，試圖保護人民的性、生育、健康等權利。這些團體在新的政府上台後，也將持續監督、對拜登政府施壓，以消除長久以來的不正義，就像他們在面對川普政府時一樣。

最高法院的消息指出，《平價醫療法案》有可能不會被廢除，而拜登政府必須負起接下來的責任。他們應該要修補關於避孕保險的漏洞、讓反歧視的保護機制重新運作，並將可能拒 LGBTQ 族群於門外的法規扭轉。他們也該重啟 Title X 計畫，大幅注入計畫基金、取消禁欲取向的青少年懷孕預防，並鼓勵 LGBTQ 的友善與接納。

拜登政府應譴責反墮胎的惡行並撤銷海德修正案（Hyde Amendment），以實現人民的墮胎自主權。海德修正案可能導致上百萬已藉由聯邦計劃取得醫療保險的人，無法獲得墮胎的保險。拜登應該透過立法推翻海德修正案、擴大醫療補助範圍，並促進遠程醫療的發展、修改食品藥物管理局對於安全墮胎藥物的使用限制。將種族主義視為公共衛生的危機，將有助於發展健康照護的可及性，以及健康的工作與生活環境，帶來新的政治氣象。

關於移民議題，拜登已經表態未來會推翻許多川普的政策。古巴移民 Alejandro Mayorkas 已被任命為國安局局長，他曾擔任「兒童入境暫緩行動（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的領導者，並將關閉一處拘留所，以表明拜登政府將扭轉過去違反法治精神以及仇外氛圍的態度。不過拜登對於 Cecilia Muñoz 的任命令人擔憂，她曾在歐巴馬執政期間，為分離家庭的政策辯護。唯有透過司法部長撤銷對於獨立移民法官的限制，拜登才可能結束家庭分離的限制，並為尋求庇護的人們開放邊境。任命更多的法官來結束積壓的移民案件，也是重伸移民正義的重要環節之一。對於生育正義打壓可能會危及移民的處境，同樣地，若能有支持移民的政策被設立，生育正義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支持。一個移民友善的政府，將為移民女性在生育醫療及公共福利上，帶來更多的便利，也會提升她們的歸屬感。抵制川普的運動，將很大程度地影響這兩個議題未來的發展。

生育正義的社會運動由有色人種女性所領導，他們為那些被邊緣化的族群發聲——包括移民、窮人、LGBTQ 族群、年輕人、障礙者等等。這個運動結合交織性與人權，從整體的觀點出發，提倡結構性的改革，並指出性權利和生育權利，和那些試圖實現平窮正義的政策是相連結的。生育正義運動的宗旨，是倡議女性在不受強迫或虐待的情況下生育子女的權利、在不受限制或批評的處境中終止妊娠的權利、在健康環境中撫養子女的權利，以及身體自主和性別認同的權利。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這項運動在全國30多個非營利組織的努力下，參與於草根組織的政治社會化、選民動員之中；他們也致力於文化遷移的事務，嘗試以正面的文化意象、尊重民間信仰與傳統的方式，使那些不穩定的議題得到控制。這些組織進行初探性研究，將發現提交至聯合國，並開展目標明確的運動、為女性提供教育與賦權、提起訴訟、通過進步的立法，取得卓越的成果。生育正義的倡議組織和提供生育醫療服務的機構，與推動生育、公民權相關政策的團體共同合作。

無論這些社運團體的關注焦點在於生育正義、移民權，或是 LGBTQ 和女性權利，他們都將繼續為了性權與生育權推進拜登政府的作為。未來將會是一場抗爭。■

來信寄至：
Patricia Zavella <zavella@ucsc.edu>

> 為氣候正義而戰 與拜登、賀錦麗政權

J. Mijin Cha，Occidental College，美國

這是一幅塗鴉，呼籲人們關注解決氣候危機的必要性。
來源：flickr。保留部分權利。

川普政府在之前為爭取第二屆任期，曾保證會對災難性的氣候變遷有所作為；但相較之下，拜登與賀錦麗執政下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的前景似乎一片暗淡。儘管新任總統拜登對氣候行動的諾言比以往任何政府更具有野心；但事實上，不論是綠色新政（GND）未來的前景或是他們對計劃的企圖心都在慢慢消失，更不用說可能抱有敵意的參議院將嚴格地限制新政府。如果聯邦政府下的綠色新政沒有什麼前途，問題就變成了：州政府和地方是否能夠達到一定的程度的努力，以實現公正合理的低碳轉型？只有在社會和經濟正義的問題被納入氣候政策討論時，州級單位的氣候行動計劃才可能提供一個公正低碳轉型的方向。

儘管保守派將綠色新政當作一種能夠脅迫控制政府的武器。但其實綠色新政並不是一項詳盡、有規範性的法規。相反地，它是一項不具約束力的決議，呼籲聯邦政府去採取遠大的凱恩斯（Keynesian）計劃，在為期十年的期限中處理不平等與氣候變遷的雙重危機。十年的期限正符合專家們的共識，也就是到2029年前必須大幅減少溫室氣體，以抵禦氣候變遷帶來的嚴重影響。在綠色新政中，若能瞭解氣候變遷和不平等之間的關係，就能在視野上超越狹窄的、技術官僚的減碳框架。此外，應該在研究氣候變遷時，嘗試理解人們的物質條件，以考量社會和經濟層面；而不是將氣候變遷作為一個單獨、特殊且具挑戰性的研究途徑。

在倡導氣候變遷之時，融合社會和經濟因素的考量是當前急需發展的方向。從過去目光短淺的碳稅或排污交易計畫（cap-and-trade program）等等技術官僚的解決方案轉變，當前整個政治領域的氣候倡導者都開始聚焦於氣候變遷的三項指導原則，將社會和經濟納入氣候政策中思考。像是曾被提及的「標準、投資和正義」，在不同氣候倡議運動之間的共同點，就是呼籲零排放或淨零排放；對低碳排放部門和基

>>

礎設施的大規模公共投資；還有關注於社會和經濟正義——創造友善、具有工會環境的工作；改變化石燃料工人的待遇和社區環境，並保護在氣候變遷之下會最先受到衝擊傷害的邊緣社區。

鑑於新任總統拜登曾宣布會優先處理氣候變遷的議題，也任命了一位負責處理氣候變遷的總統特使，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氣候變遷會成為拜登與賀錦麗執政的新政府優先處理的議題。但儘管政府承諾會應對氣候變遷是讓人欣慰沒錯，但在實現低碳轉型這條路上的各個層面依舊是困難重重，因為社會和經濟層面中確保「公正」轉型上的考量點，最容易受到政治上溫和派陣營和敵對的共和黨參議院抵制。溫和派民主黨在大選後馬上就針對改革上的問題發起攻擊，例如全民醫療保險（Medicare for All）和停止向警察撥款等，而這也顯示了執政黨在敵對參議院中，將不會獲得種族和經濟正義議題向前發展所需的強大支持。

在無法預料聯邦政府對於低碳未來會採取什麼行動之下，最好的情況還是人們將注意力轉移到州級單位上，這樣才可以邁向公平的低碳轉型。實際上，甚至在川普執政之前，各州就已經處於計畫推動氣候政策的領先地位上了。但就聯邦政府而言，這些氣候政策是否公正仍取決於政策的制定和實施。當加利福尼亞州採用排污交易計畫時，環境正義的倡議者就因為計畫帶給環境正義社區的負面影響，而決定提起訴訟，要求停止該計劃。最終訴訟並沒有成功，提起訴訟的組織還受到了傳統環保組織的強烈反對。最近針對排污交易計畫的評估發現，人們對於環境公正的關注已有良好基礎；另一方面，也發現自實施排污交易以來，弱勢社區中局部污染的現象有所增加。此外，儘管加州有承諾過要在排污交易中達到一定的目標，但仍無法實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要求。

相較之下，紐約州通過了美國最具有企圖心的氣候政策，其成功的原因是建立了以公平條款為中心，有著寬廣基礎、多議題導向的聯盟。《氣候領導力和社區保護法》（Climate Leadership and Community Protection Act）並不只是單單關注於減少排放量的問題，而且還優先投資於弱勢的社區。整個氣候法案還取決於伴隨通過的法案：這項法案建立了一個永久的環境正義諮詢委員會和也確立了其他條款。正義與氣候之間的連結就這樣產生了具有企圖心且公平的氣候政策。

州級單位下的氣候工作成果也為低碳轉型提供了一系列模型。在這些成果背後的核心精神就是，要同時解決氣候和不平等的雙重危機。用薪水低落的低品質可再生能源製造工業，去取代薪水高、更可能會有工會的化石燃料製造工業，雖然是能夠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但這並不是一種公正轉型。另一方面，過去的能源轉型未能兼顧到工人和社區，像是去工業化就使得化石燃料工人更加抵抗其他種的強迫性能源轉型。諸如氣候領導工作（Labor Leading on Climate）和氣候工作國家資源中心（Climate Jobs National Resource Center）之類州層級的倡議行動，也有邀請州地方與當地工會一同參與，推動有利於工人與氣候的政策。在創造優良工作機會的同時，也與減輕排放量的議題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為可以利用工會的政治力量，所以這些行動非常地有效。從紐約氣候工作組織（Climate Jobs New York）的成功來看確實證明了這一點，其中正承諾要提供15億美元來創造40,000個氣候相關工作。

由於拜登與賀錦麗執政的政權，很可能會出現將公平與正義的條約置之不理的危機，因此州級單位必須努力帶頭推動公正轉型。最後，考慮到從化石燃料過渡到其他能源的程度和範圍，解決氣候危機需要國家和國際間的共同努力；而氣候政策仍不能脫離經濟和社會因素去考量減輕排放量的問題。州級單位所付出的努力，正可以給予我們一條指引的道路：如何推進公正轉型，並進一步解決氣候與不平等、社會不公正三者之間共同的議題。■

來信寄至：
J. Mijin Cha <mcha@oxy.edu>

> 基進補償方案

Marcus Anthony Hunter，UCLA，美國

在超過四百年、四千個月、或兩百萬分鐘的歲月中，美利堅合眾國始終都沒有擺脫奴隸制的罪行。即便許多倡議者和學者宣稱在亞伯拉罕·林肯頒布《解放奴隸宣言》後即宣告了奴隸制的死亡，但實際上，奴隸制卻似未被治癒的病毒般，以各種形式持續地向四處擴散和感染，證明自己仍然存在。從監獄工業複合體(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塔斯基吉梅毒實驗(the Tuskegee experiment)、到鏈鎖群犯(chain gangs)，那個宣稱已經廢除奴隸制度的政府，仍然讓黑人的生命停留在脆弱且沒有保障的狀態之中。

源自於貪婪、種族歧視、強暴欲望和殖民主義的美洲奴隸制及更廣泛的歐洲奴隸交易，詆毀、侵犯、羞辱了黑人的人性尊嚴。數以十萬計的黑人從自己在非洲的家鄉被帶往西非港口，經殘酷的中央航道(Middle Passage)越過大西洋後，被送往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原住民居住的土地。他們不是死在航運的過程中，就是死在南方的田野裡或是北方的地下室；他們大都死的早，但是已經足夠將下一代奴隸再生產出來。

黑人被奴役，他們的身體和家庭被奪去、靈魂被日日冒死的生活摧毀、免費勞力被視為理所當然，這些種族歧視歷史和反人性且痛苦的事實，是我們所繼承的。同時，我們也繼承了繳清這些債務的責任，即是所謂的補償(reparations)。這些經年累月且不曾停止的反人性罪、創傷、債務直到現在仍然沒有被償付或調解，在這個過渡時期，黑人不得不臣服於深深地鑲嵌在國家中的反黑人基因的監視之下，並系統性地被放任自生自滅。

將近五百年後，精確地計算並且償付對黑人造成的傷害已經變得不再可能。誰能獲得補償？怎麼獲得補償？為何得以獲得補償？在奴隸主都已經死去許久的現在，我們又要找誰負責？這些關於補償的疑問構成了自1865年以來的爭論，卻也讓修補的嘗試成為可能。

近年來，跨政治立場的政府都為補償做出了令人信服的案例，但是無論是保守派或者進步派的倡議者，都在絕大部分的案例中誤把補償等同於金錢賠償。金錢賠償或經濟上的賠償有其重要性，但這不代表修復的全部。更甚者，這些對金錢持續且反覆地強調容易讓人以為奴隸制所帶來的死亡與苦難可以被空白支票上的數字所代表，而這些數字的決定權掌握在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訴訟律師的手中。但是，人們的靈魂跟生命是有固定市場價格、或是可以被金融貨幣估價的嗎？一旦被支付後所有當事人就都解套了嗎？人命的價值是可以僅僅被金錢所衡量的嗎？這些問題的解答有賴堅定的信念—即黑人的命不僅是有價值的、而且是超越價錢的。因此，我們必須根本地重新審視補償的意義，認清那些真正的損失和虧欠不能輕易被以貨幣化了事。

若想要將美國轉化成為一個更自由、更安全、更正義的社會，我們就必須試圖面對和治癒過往未被明確識別的、集體的種族歷史以及創傷。那裡有成堆的債務等著我們去與之和解、有被侵害的過去等著我們去免除和平反、有懸而未決的種族平等和公平問題等著我們去修補。上述遺緒對應到七種補償面向，是前所未見的、也是欲通往全面的治癒和重建所不可或缺的：

· 政治補償：修復性地、且帶有歷史意識地轉變政府中的政治代表性。
· 知性補償：對遭受奴役的人們及其後代的創造、發明以及想法給予特別及公開的肯認。
· 合法性補償：在法律和政策中建立修復式正義及種族公平性的合法性。

>>

「如果我們要把美國轉變成一個更自由、更安全、更公正的社會，我們就必須正視和治愈我們混亂的、集體的種族歷史和創傷。」

· 經濟補償：金錢或貨幣的協助、補貼、返還、以及債務減免。
· 社會補償：修復社會契約以終結種族主義和種族階層意識，確立人性尊嚴。
· 空間補償：社經和政治機會的地域性修復，特別是那些因奴隸制而流離失所或是被剝奪權利的人們及其後代。
· 精神補償：對那些在奴隸交易網絡和美國奴隸制下喪失其宗教和精神信仰、實踐機會以及信念的人們給予特別的承認及代表性並使之復原。

這七種形式的補償，將是美國及其海外不可或缺的追尋，為了結束種族不平等，以及治癒那些由奴隸制、奴隸貿易、奠基在奴隸上的全球貿易和受上述歷史所公認、流傳的被改變、扭曲的文化觀念所帶來的罪過和後續影響。黑人並沒有自願為奴，事實上，沒有任何一個人類應該在如此沒有人性的殘酷體制下生活。相反地，黑人和與他們同樣處境的美洲原住民有資格從那些辜負他們、並從他們身上榨取幾世紀金錢的全球、聯邦、區域和地方政府機構索取某種形式的救濟、修復、還有賠償。

欲達成這些要緊的轉變，真相、種族的癒合、以及轉型缺一不可。這種取徑與由 Queen Mother Audley Moore 和前眾議員 John Conyers 發起且被現任眾議員 Sheila Jackson-Lee 繼承推動的 H.R.40（研究和製定非裔美國人賠償建議委員會法案）在要求補償非裔美國人的呼籲上是一致且互補的。在眾議員 Barbara Lee 和參議員 Cory Booker 的領導之下，目前也有建立國家級 TRHT（真相、種族癒合和轉型）委員會的呼聲，是我設想中一個永續的國家、地方、區域級 ARCH（種族及文化癒合檔案室）的第一步。

美國必須抓住這個歷史機遇去追求種族的平等和癒合，以轉型成一個不再區分人種階級的社會。在拜登—哈里斯的執政下，如果這項計畫在行政和法律層面都被認真對待和執行，美國就能在世界的舞台上成為一個具有說服力的轉型案例，展現透過承認和紀錄真相以及追求有意義的種族癒合，的確可以脫胎換骨成一個所有人都被公平地對待、都被給予有意義的參與權、且擁有第一等公民權的國家，避免和減輕了未來可能的傷害。如果我們能有意識地、急切且團結一致地建立專門的公私基金、國家和地方級 ARCH、TRHT 委員會、以及可實行且有針對性地補償政策，就可以確保那些非人道歐洲奴隸交易的遺產將會終結，而我們將會踏上全新的旅程。真相，是種族癒合轉型、以及未來繁榮的關鍵。■

來信寄至：
Marcus Anthony Hunter <hunter@soc.ucla.edu>

> 在歐華人處境的變遷

Fanni Bec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奧地利，以及 **Pál Nyíri**，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荷蘭

在1998年，一本主題為歐洲華人的論文集指認出連續幾波華人移民到歐洲的浪潮：有二十世紀初的浙江省小商人、二十世紀中葉來自香港和週邊區域的殖民移民、越戰後去殖民化風潮中的東南亞後殖民移民、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80年代改革開放後的商人及勞力移民。這些移民潮造就了獨特的社會語言團體，團體間極少交流，但有著廣泛的跨境聯繫。這些團體在二十世紀末的社經地位普遍來說仍是相對低的，但卻在不同的區域展現出異質性。在西北歐，他們大多從事餐飲業；在南歐，他們會出現在小型的成衣工作室；在東歐，他們則在市場和小店面進口並販賣消費品。

來到新世紀，在歐華人的社會人口組成和社經地位經歷了根本的轉變。首先，如專刊中莊雅涵、蓮娜和陳秀琼所紀錄的，一個在當地出生、不斷向上流動的華人世代已經成年。這個世代的華人對於歧視更加敏感、且更接受自由派的反種族主義論述，但他們同時對於歐洲經濟成長趨緩感到失望，而此時中國的各種機會在向他們招手，這促使了這一個世代的年輕人移民回中國、或過著跨國的生活。儘管過去曾將移居歐洲視為實現社會流動的捷徑，但如今這些移動的方向更加複雜。

從中國到歐洲新一代移民的樣貌反應出全球政治經濟的劇烈變化：華人經營的餐廳和商店中的職位漸漸被其他移民團體接管，且華人的主體不再是小商人或體力勞動者（即便一種新型態的、由國家主導的、常見於在東南歐的中資基礎建設項目的勞力移民正在興起中），而是如同 Thøgersen 以及 Beck、Knyihár 和 Szabó 所紀錄的，被學生、隨著中共資本向海外擴張的外籍經理人、以及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移民取而代之。因此，歐洲華人早先的社會語言劃分開始變得複雜，且逐漸被階級分層所覆蓋。

華人在歐洲社會中的地位出現改變並非僅源自於所謂的第二、第三代移民的「融入」和提出的政治要求，以及新一代移民較高的社經地位，也與地緣政治的變化脫不了關係。中國是一個讓人又羨慕又害怕的存在，隨著歐盟跟中國的關係日益敵對，中國政府想將在歐華人變成政治說客的意圖愈來愈明顯。雖然這些舉動並不新鮮，但是中國社群媒體在歐洲的出現、以及中國對抗新冠肺炎的成功，讓中國這些政治企圖更加地有效且有說服力。如鄧婷的著作指出，其中一個影響即是中國日趨膨脹的國家自信讓在歐華人們開始質疑那些讓他們被邊緣化的種族階級制。同時，Gledić 以及 Beck、Knyihár 和 Szabó 的著作指出，那些與中國友好的國家（如塞爾維亞和匈牙利）並沒有讓自己國內的華人直接受益。

新冠肺炎疫情凸顯了在歐華人地位的轉變。有些華人成為中國口罩外交的工具，很多人也因為「中國病毒」而遭遇口頭或肢體上的暴力對待，成為原先潛伏已久的歧視、排外情緒、以及持續升高的政治疑慮的宣洩口。當疫情的情況反轉，那些想回中國躲避疫情的華人，卻發現祖國用經濟上的障礙、對「受污染者」的歧視、以及不忠不義的標籤阻擋他們回去。但是，如同 Bofulin 所言，原先在歐華人的內部再自然不過的跨國移動能力，卻也開始受到其他中國移民的質疑和譴責，因為他們渴望揪出傳播疫情的罪魁禍首。

>>

如今，社群媒體加劇了這種恐慌。如果說1990年代末期中國在歐洲的媒體，仍是由不同政治取向的地方報紙和剛起步的衛星電視所組成，那現在媒體已經變成完全由接受中國政府審查的社群媒體平台（如微信）來主導，成為中國政府觀點和民族主義的傳聲筒，容不下其他意見。該網路領域是必要的動員工具，但也與臉書和推特這類平台共存，將它們視為通往歐洲公眾輿論的橋樑。當那些在法國出生的華人倡議者受到「黑命貴」這類反種族歧視的運動影響，而嘗試用臉書去尋找其他少數族裔的盟友時，義大利的華人企業家卻建立起自己版本的種族等級制度，同時匈牙利的中產階級華人緊跟著再次復興的「白」歐洲理想，這些理想在當地政府的推波助瀾下，與微信上流行的種族理論不謀而合。如果前者是透過訴諸反種族主義與反精英主義的團結來抵抗歧視，那麼後者就是以種族和階級秩序的之名這樣做的，尤以歐亞精英為最。

本次專題的貢獻者們[1]將其研究立基於跨族群關係形成的實體空間，從寄宿學校到酒吧，以識別和分析在歐華人的印記—不斷變化的內外邊界和階級制度。■

來信寄至：
Fanni Beck <Beck_Fanni@phd.ceu.edu>
Pál Nyíri <p.d.nyiri@vu.nl>

1. 本次研討會的想法源於2020年10月16日中國歐洲研究網路在布達佩斯舉辦的「民族間關係:中國移民及其歐洲東道國社會研討會」，該研討會得到了COST協會的支持。

> 在法華人：從沉默到行動

Ya-Han Chuang（莊雅涵），Institut national d' études démographiques (INED)，法國，**Emilie Tran（陳秀琼）**，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以及 **Hélène Le Bail**，CNRS，CERI-Sciences Po Paris，法國

在法國出生的亞洲人在巴黎示威，反對反亞洲的種族歧視。
來源：Camille Millerand。

如同在英國和荷蘭等其他西歐國家，華人社群在法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之初。早期華人的出現有三個關鍵因素：殖民、一戰期間招募的華人勞工、以及戰爭期間滯留當地的學生。這種早期流動性對近期的移民浪潮產生了影響：由於1978年後早期的移民網絡歷經重建，如今浙江省的溫州已經成為法國華人移民及其後代主要遷移來源地。此外，法國殖民的遺產之一是東南亞海外華人的出現，他們在1970、1980年代以難民的身份從柬埔寨、越南和寮國入境法國。在世紀之交，法國華裔人口的組成在原籍地、遷徙路線和階級方面都變得更加多樣化。特別是在1990年代，中國北方由於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而遭受大規模裁員的衝擊，使得法國成為大量來自中國北方人口的移民目的地。一般來說，入境歐盟的主要合法管道仍然是學生簽證。在法國，華裔留學生是僅次於摩洛哥裔的第二大外國學生群體（佔9%）。

法國是歐洲華人移民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雖然沒有官方的族群統計數據，但據估計約有40萬位華裔移民及其後代）；在擁有居留權的外國人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位居第五大群體。這些華裔移民的多樣性不僅體現在教育程度、職業和經濟地位上（富裕的投資者、跨國貿易商、專業人士、學生、企業家以及工人），也體現在世代、流動性還有對法國社會的參與程度上。相對地，他們也共享一些特徵，像是來自東南亞與來自中國（主要是溫州）的華裔移民在僑民企業圈的合作、以及近期在揭露人身安全問題和日常種族歧視的集體行動。

> 反抗種族歧視的集體行動

在巴黎及其鄰近郊區的華人社群常常成為偷竊和小型犯罪的受害者。這不只是因為華人常被認為很富有—他們的生意或慶祝活動（例如奢華的婚宴）都常集中在多族群、社會經濟貧

>>

困的地區，也因為在被攻擊或搶劫之後較不願意尋求警方的協助。對於無證移民與小企業家來說，岌岌可危的身份狀態和對法國政治的冷漠都使他們長期不願意參與動員。

然而，在過去十年，隨著越來越多對於人身安全的擔心與意外的發生，在巴黎的華人社群—曾經被視為沉默、甚至是努力工作又保持低調的模範少數群體，已經組織了五場以上的大規模抗爭，要求警察提供更多保護。有時候，這些抗爭也會被中國領事館以「保護海外公民」的名義支持，符合中國政府自2012年起以維護其公民可能受損的利益之名向外投射影響力的方針。這五個集體動員案例在動員方式上有所差異：其中三個是大型街頭抗爭、一個是企業家聯盟轉型成的（失敗的）壓力團體、最後一個是街頭暴動與和平集會的混合體。這些行動通常都在強調華人居民和商人在特定社區中所缺乏的安全感，並且提出類似的訴求：增加警察在社區的巡邏、加重對違法者的罰則、以及讓華人受害者投訴的管道更加暢通。

2016年，一個華人勞工在巴黎郊區被殺害後，隨之而來的那場街頭抗爭是一個轉捩點，標誌著第二代在法華人挺身而出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在法國出生的華裔重塑了他們的主張：強調在針對華裔或亞裔社群的暴力行為下，存在更深層的結構性種族歧視。華人或亞洲人的社會運動在北美和澳洲都已經被研究很長一段時間，但是在歐洲卻是一個新的研究焦點。在法國的案例當中，我們可以辨認出在法華人的三個主要行動類型，都與刻板印象的再現以及尋求認可有關：（1）集體記憶的收集和傳播（2）反對針對性暴力的動員（3）以文化行動主義來解開並修正對於亞洲人刻版印象的再現。

要瞭解在當地出生的法國華人最近的行動，就必須回到2000年代，當時線上社群網絡才剛開始普及，成為將個人經驗轉化成集體經驗的場域，特別是那些對輕微的冒犯、與隱微的種族羞辱的共同經驗。那時，在法華人開始在臉書、以及後來的微信和推特創建論壇跟討論群組。在這些地方，他們以法文為主要語言（但有時候混雜著中文或是其他亞洲語言）分享自身經驗。

在2016年後發展起來的「文化行動主義」也主要以線上工具如短影片、部落格、YouTube頻道、網路系列節目和Podcast作為平台，讓藝術圈和媒體圈的在法華人有更多機會建立連結。自2016年起，很多人對建構集體認同、以及反對針對亞裔的歧視都有貢獻。有些人試圖將這些行動跟其他少數族裔的倡議連結起來，例如Grace Ly與著名的非裔女權家Rokhaya Diallo合辦的Podcast—Kiffe ta race，或是亞裔法人對黑人命也是命抗爭（Black Lives Matter protests）的參與，用以緩和跨族群間的緊張。其他人將族群／種族的議題與性別議題交織在一起，以解構對亞裔女性和男性的性幻想。

2020年，新冠肺炎給了中國一個在國際上做外交宣傳的好機會，得以動員海外華人來講「真實的中國故事」。中國政府是否、或是在什麼程度上會利用這波被疫情激發的、以華人為主體的反種族歧視熱潮仍是未定之數，但更有趣的是比較在法的第一、第二、第三代華人對祖國跨國動員的反應。■

來信寄至：
Ya-Han Chuang <ya-han.chuang@ined.fr>
Emilie Tran <emilietran@hkbu.edu.hk>
Hélène Le Bail <helene.lebail@sciencespo.fr>

> 中國留學生在歐洲

Stig Thøgersen, Aarhus University, 丹麥

歐洲校園中的中國學生。
來源：創用CC。

1978年，鄧小平宣佈中國每年要送三千到四千個學生出國，以打破國家的科技孤立狀態、加速現代化的進程。當時看起來雄心勃勃的計畫跟現在的情況比起來簡直小巫見大巫。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統計，在海外高等教育機構註冊的中國學生有將近百萬，他們的學費是許多大學重要的收入，而且他們本身也是中國國際能見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歐洲國家正在接收這批出走潮中屬於自己的那份，英國分到107,000人，為歐洲之首，僅次於美國和澳大利亞。考量到英文是中國教育中最重要的外語，這也沒有特別令人驚訝。其他歐盟國家裡排名較高的大學也收到不少學生，像是德國有超過30,000人、法國將近24,000人、以及義大利超過15,000人。就連小型的歐盟國家例如瑞典、愛爾蘭、匈牙利和瑞士也都有差不多2,000位中國學生。歐陸國家的獎學金、較美國和英國低廉的學費、申根簽證可以走訪多個國家的便利性都是吸引學生去非英語系國家的因素。很多人也被歐洲的文化、尤其是法國跟義大利的浪漫氛圍和生活方式所吸引。

> 近幾十年來學生樣貌的變化

很多事情已經與1978年毛澤東時代剛結束時不一樣了。第一，當初留學生被國家小心翼翼地控制，並且作為國家戰略的一部分，但是如今出國的原因已經回歸到個人和家庭的野心，自費學生的比重甚至高達90%。這個現象將國際教育領域形塑成一個高度商業化的市場，有很多因素影響學生的目的地的選擇：大學的排名和聲望、學費和生活費的負擔、收到留學國補助的機率、想像中的社會安全程度、留學國的名聲等，這些因素都在這個複雜的遊戲裡佔有一席之地。其中，中國私人教育代理機構已經嗅到了商機，不僅指引協助學生還有他們的家人做出棘手的決定，還幫他們處理複雜的註冊和簽證手續。

第二，出國留學已經不再是中國學生的首選。回頭去看西元兩千年的時候，大部分的中國學生把取得已開發國家的彈性公民權當作最高目標，但現在可以進入中國自己排名前面的學校反而更有吸引力。除非真的是名牌大學，不然外國學歷的社會聲望下降得很迅速，中國媒體也大

>>

量報導那些所謂的「文憑工廠」還有低品質的學程。雖然如此，在國家級的入學考試—人見人怕的高考—的控制之下，中國高等教育系統是非常階層化的。所以，與其去一個二三流的大學拿一個沒什麼就業前景的學歷，很多中產階級學生及家庭寧願去國外尋找就學機會。

第三，過去學生把出國留學當作移民的起始點，但是現在的學生卻把留學當作回國內就業的跳板。在1980年代，特別是在1989年六月對民主運動的鎮壓之後，只有極少數有國外學歷的中國人會想要回去。但是在21世紀，上述的情況有很大的改變，原因在於歐洲就業市場萎縮、中國就業機會及薪水提高、再加上一系列鼓勵回國就業的國家政策的推波助瀾。雖然現在中國政府不再鉅細靡遺地規定誰該去哪裡留學，但是他們仍然需要一些人才回流來促進國家發展。最後，中國的教育移民比以前年輕的多。大學生比研究生多，甚至很多家庭為了讓他們的小孩能夠進國外的大學，在高中就把他們送出去好，讓他們在文化上跟學術上都做好準備。

大部分早期有關中國留學生的研究都聚焦在西方老師對他們的抱怨上，像是在教室裡太安靜、躲在同溫層的小圈圈裡面、還有對教育的工具性態度。這些問題還在，但是近期的研究以更寬廣的視角來看待這些留學生的經驗。相對於逐漸個體化的中國社會，留學生傾向將他們的留學經驗看作是「自我認同改變與轉化的情感旅程」，擴展了他們的視野、使他們在專業與成為當代世界公民的面向上更具競爭力，是個人邁向成熟、改變一生的經驗。與他們的西方同儕相同，年輕的中國留學生把更廣泛的旅行結合進他們的學習過程中，以融入異文化並且測試自己在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下的生存和成長能力。這也意味著，雖然仍有許多學生選擇所謂的「硬」科學和商業研究，但我們也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學生在完全認知到他們可能無法在中國或歐洲就業市場中找到一個安穩的工作的前提之下，仍然選擇進入更「軟」的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領域。

眾多的留學生已經改變了在歐華人人口的組成，但我們卻對他們如何跟華人社群互動所知甚少。一個法國研究指出，雖然中國學生間已經可以建立強連結，但是與既有的華人社群的互動是非常有限的。另一個英國研究卻發現這些互動在增加當中，而且中國大學生對華人離散社群的進一步發展是相當重要的。

在過去的幾十年當中，中國留學生的數量是持續增加的，但是兩個近期的趨勢卻讓未來更難以預測。其一是2020的疫情暫時封鎖了大部分的教育交流，而且很有可能延續到2021，尤其是中國人把歐洲視為疫情的熱點。再來，西方跟中國的關係愈來愈緊張，導致中國的形象在歐洲變差，中國留學生也就成為潛在風險。在這個層面上，國際政治可能會影響未來歐洲與中國之間教育移民。■

來信寄至：
Stig Thøgersen <stig.thogersen@cas.au.dk>

> 布達佩斯的「黃金簽證」中國移民

Fanni Beck，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匈牙利，**Eszter Knyihár**，Eötvös Lorand University，匈牙利，以及 **Linda Szabó**，Periféria Policy and Research Center，匈牙利

隨著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中的位置變化、以及其社會結構的重組，越來越多的都市中上階級家庭正移居到全球某些少數的國家。調查顯示，這些有錢人的出走動機已經超越了物質主義、不再以財富積累為目標，他們形成了一個「黃金簽證」的市場，讓一些國家得以用販賣居住權和公民權來吸引國外投資。近年來，許多領取黃金簽證的中國人開始偏好移民中東歐國家，因為那邊的政府會用更便宜的移民方案來歡迎他們。

> 匈牙利的「黃金簽證」方案

匈牙利的「黃金簽證」方案是這個新興市場中最歡迎的方案之一：當這個方案在2013至2017年實施時，不僅是整個歐盟中第二便宜的、申請手續的便利度和速度也都超越其他對手。在這個方案中，除了必須花250,000歐元（後來變成300,000歐元）購買五年期的國家債券再加上佣金之外，沒有其他的要求。因此，超過一萬九千位申請者（其中81%為中國人）獲得了居留權的許可。雖然這個方案是特別為了「移民不移住」者所設計的，但似乎沒有吸引到那些不是要真正的移民、只是想在歐盟中獲得移動便利性的商務人士，反而吸引到那些抓住機會移居國外的家庭。他們把投資當作工具來完成非經濟性的目標：尋找一個孩子能健全成長的環境。

在匈牙利領取黃金簽證的中國移民是來自中國大都市（特別是北京、上海和廣州等一線城市）的中產階級家庭，他們依靠的是來自中國的收入或匯款，與1990年代早期移居匈牙利、來自中國東南省份的小商人不同，他們並不以經濟或財富的積累為目標，而是追求在一個擁有綠色環境、文化飽滿、且以白種人為主的城市中，享有休閒的生活方式。簡而言之，就是追求在一個正統的「歐洲想像」中生活—雖然是用打折過後的價格。

推廣匈牙利的「黃金簽證」項目。
來源：http://immigration-hungary.com/EN/。

這些家庭決定離開中國、選擇匈牙利的原因，是來自於中國改革時期的一胎化政策對他們帶來的歷史、社會與政治性影響。當中國政府在1970年代末期引進家庭計劃的時候，其中一個合理化的說法就是減少人口的數量會讓提升其素質。於是這變成中國中產階級父母的某種堅持：盡最大的可能去培養子女的「素質」。根據官方的論述，一個人在身體上、品行上、以及教育上的素質不止取決於個人的努力，也與環境的影響有關，但是中國的都市並沒有辦法滿足這些家長對環境的期待。

> 打折後的歐洲家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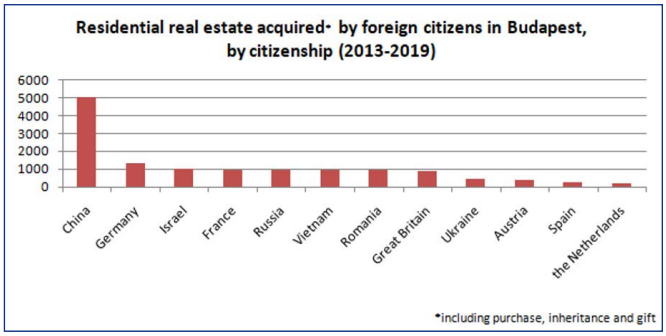
有鑑於此，匈牙利是中國中產家庭的理想目的地，有著物質、社會、及教育上令人滿意的環境，以及負擔得起的生活開銷。對許多中國黃金

>>

「自匈牙利黃金簽證項目推出以來，截至去年，外國人在布達佩斯購買房產的數量大幅增加。」

簽證移民而言，目標是找到一個位置好且合適的房子，除了當作投資以外，也是一個「家」。一個理想的「家」的概念，與想要定下來、安頓下來的感受脫不了關係，也連結到房屋所有權。擁有一個可繼承房屋的可能性，讓中國移民有機會在匈牙利（大部分在首都布達佩斯），以更低的固定資本支出、過著比中國的大城市或是任何現代資本主義下的樞紐城市更高品質的生活。

自從匈牙利的黃金簽證方案實施後，布達佩斯房地產被外國人收購的案件大幅增加（直到疫情之前），即使房地產市場普遍繁榮，中國人還是外國個人投資者的最大宗群體。



在中國移民者中，不只拿黃金簽證的人會被布達佩斯的房產吸引，相當數量的小商人也轉向房產投資。我們的研究指出，雖然布達佩斯的市中心受到雙方的歡迎，但是小商人更傾向購買在中國批發和零售市場旁邊、或是比較可以負擔的起的東側郊區；反之，黃金簽證移民則對新的住宅區、擁有丘陵且綠意盎然的西區、以及都會區的獨立式住宅更感興趣。

雖然一部分的黃金簽證移民試圖購買可以當作投資標的又可以定居的房產，但是當他們在選擇一個「家」的時候，還是會尋找在好學區、好社區內的公寓。「素質」的抽象概念反應在空間上，評估的標準是社區及學校的種族（在這邊指的是羅姆人或是移民的小孩）和階級構成，體現了一種選擇性的世界主義。許多剛到匈牙利的中國人雖然被西方的生活方式吸引、卻對穆斯林和黑人的存在感到不自在，因此傾向支持政府的反移民右翼民粹主義—即便他們本身也是移民。許多中國的新來者強調匈牙利比西歐其他國家更歡迎他們、且幾乎感覺不到任何歧視，但諷刺的是，也是這群人在讚嘆政府的嚴格移民政策—接收更少的難民、穆斯林和非裔移民—好讓他們擁有更多安全感。

匈牙利居住權或是公民權的給予，被政府透過黃金簽證方案、或是國家間外交的特殊管道，策略性地作為政策工具，以取得西歐以外的經濟資源。這些行為不但鞏固了統治精英的經濟利益，也提高了國家對歐盟的經濟和政治籌碼。作為跨大西洋權力集團外崛起大國的公民，中國黃金簽證移民可能成為這個過程的受益者；諷刺的是，他們可以在這些充滿爭議的政經形勢之下，在布達佩斯得到「家」的感覺、並且在歐洲獲得歸屬感。■

來信寄至：
Fanni Beck <beck_fanni@phd.ceu.edu>
Eszter Knyihár <nyihar.eszter0302@gmail.com>
Linda Szabó <szabo.linda@periferiakozpont.hu>

> 義大利華人：商業與認同

Ting Deng(鄧婷)，布朗大學人口研究與培訓中心，Brown University，美國

米蘭唐人街的一個郵箱上有中國的小床租賃廣告。
來源：Ting Deng。

袁先生於1988年出生於波隆那(Bologna)，是第三代華人。他的家人於1930年代起陸續抵達義大利。第一個踏足義大利的是袁先生祖父的哥哥。他與其他幾個單身的同鄉一起到義大利，想在海外做生意碰碰運氣。儘管法西斯政權阻擋異族通婚，他還是像當時的許多華人一樣娶了鄉下來的義大利女人。袁先生的叔公沒有像大多數華人一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回國，而是留在自己的手工作坊裡與他的義大利妻子一起製作皮包。他們生了幾個孩子，但據袁先生所說，這些孩子與後來移民義大利的親戚已經斷了聯繫。1950年代，袁先生的祖父離開家鄉，離開仍留守在中國東南沿海溫州地區一個小村落裡的妻兒。他前往義大利，在他哥哥家的皮革廠做工。1978年，袁先生的父親和兄弟姊妹前往義大利與祖父團聚。袁先生的父親後來開了一家中餐館，他的母親和姐姐隨後也移民過去，一起打理餐館。這家中餐館位於波隆納華人人口最稠密的社區。袁先生父親的兄弟姐妹也都各自開了工廠或餐館。袁家人的故事是一個經典的鏈式移民的案例。親戚們一個個地都移民到了義大利，先在自家人的事業裡工作，再自行創業。

這些早期的溫州移民可能沒有一個人會預料到，從他們開始的鏈式移民最終將帶動成千上萬的中國非技術勞工來到義大利和歐洲其他地方。自中國向資本主義世界開放以來，這些中國移民渴望在歐洲迅速致富。從1980年代中期到2008年全球經濟衰退期間，中國輸出的移民順應了義大利勞動力市場的需求。義大利勞動力市場需要廉價靈活的跨國勞動力服務于全球快時尚行業中新興的義大利製造品牌。

>>

製造業手工作坊和中餐館是義大利華人移民的兩種主要的致富產業。當中國成為全球商品生產國和出口國時，進出口貿易和相關批發業務，就成為自1990年代以來華人移民追求經濟成功的一條新途徑。2000年以來，前往義大利的大規模中國移民已經逐漸消退，而在義華人移民的觸角伸向小型零售和服務業。越來越多的華人轉而投入針對在地多元人口的小型鄰里企業，包括咖啡館、百貨店和理髮店。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的華人移民參與跨國生意。一些人去中國投資，而另一些人則加入了蓬勃發展的微商行業，利用中國社交媒體平台微信，做起了中義兩國華人消費者的生意。

義大利華人內部也日益凸顯出世代間的差異性。在義大利出生或至少在義大利長大的華人不再像老一輩一樣滿足於依賴廉價勞動力的族群經濟。越來越多的華裔接受了高等教育，並致力於進入主流勞動力市場。然而，華人的身份和原本的族群資源仍然是年輕一代華裔賴以生存的重要社會和文化資本。一些當上律師、醫生和其他專業人員的華裔，主要還是服務于華人社區；一些人則進入在義大利有跨國業務的中國國企和私企；還有一些人回到中國為義大利公司或其他跨國公司工作。諷刺的是，袁先生和他那代華裔在不認為中文重要的環境中長大，卻在成年後開始學習中文。現在，袁先生那個世代的年輕父母認為中文對他們的孩子來說是必須掌握的技能。

對於義大利華人而言，中國不再只是一個他們欠缺實際生活經驗的想象中的遠方。中國作為一個不斷壯大的經濟強國，在塑造義大利華人的族群經濟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華人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種族群資本（ethnic capital）。他們希望從中受益，以便在不穩定的經濟現狀和未來中生存。但是，中國不僅僅是義大利華人獲取資源的來源。對於他們來說，中國也變成他們評價義大利的參照點。與中國的經濟成功相比，許多人對義大利的經濟停滯感到不滿，並對日益多元文化的歐洲感到幻滅。許多人批評他們遭遇的日常歧視，但往往也內化許多主流刻板印象，並以此評判其他移民，以及那些在他們經營商店或酒吧時遇到的義大利人。他們常常認為義大利人都很懶散，且沒有華人勤奮。在羨慕義大利人熱愛休閒、享受生活的同時，許多華人也相信正是這種特質導致了義大利的經濟困境。

在包括香港反送中運動、新疆、還有新冠肺炎疫情等一連串和中國有關的爭議事件中，許多義大利華人在西方媒體的漫天指責中迅速站到了中國政府一邊。中國做為崛起中的政治經濟強國不僅重新描繪了義大利華人族群經濟的樣貌，也催生了一種離散國族主義，重新形塑了義大利華人的族群意識。就這點來看，袁先生祖父一代離開的那個中國和當時落地生根的那個義大利似乎都早已面目全非了。■

來信寄至：
Ting Deng <ting_deng@brown.edu>

> 塞爾維亞華人的身份變化

Jelena Gledić, University of Belgrade，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首都的一家餐館試圖吸引中國游客。來源：Jelena Gledić。

在過去的十年中，中國與塞爾維亞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為移民社群帶來改變。塞爾維亞華人從原本在經濟危機時期做為必要、但不受歡迎的局外人，轉為既被視為發展機會、又是潛在威脅的複雜群體。

> 第一波移民

1990年代，匈牙利簽證政策的不利變化之後，第一批較大規模的中國移民南遷到塞爾維亞定居。他們大多是來自中國南方省份的商人，從事跨國業務、生活在相對獨立的社區。他們繼續在貝爾格勒德（而非布達佩斯）地區從事批貨貿易。這些企業家似乎以轉型經濟為目標，希望以此從特定商品稀缺中獲利。他們的存在，可被視為中國東歐遷徙歷史的延續，也是中國全球地位變遷的結果。我們也能透過塞爾維亞在歐洲的地位來理解此現象——作為中國商人的理想貿易地點，塞爾維亞雖然有著比歐盟寬鬆的管制，但是願意在此永久居留的移民並不多。多數小孩仍然被送到中國讀書，當地的華裔出生人口也因此較少。隨著塞爾維亞加入歐盟的近程減緩，許多中資企業轉移到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義大利、克羅埃西亞和其他歐盟國家，甚至是南美和非洲。

有些研究曾以塞爾維亞人中的第一批華人社群之地位為主題。人們對這些中國移民的印象大多是負面的，並認為他們出售的商品品質低落；不過塞爾維亞人也感謝他們提供各式各樣的商品，尤其這些商品在1990年代的經濟制裁期

>>

間供不應求。由於中國移民和擾人的歷史動盪時期之間有所連結，加強了他們不利的地位。

> 新的移民與移動

2009年中國和塞爾維亞建立策略夥伴關係之後，兩國的合作迅速發展。在一帶一路的政策下，中國在塞爾維亞的建築和投資有了大幅度增長，也加強兩國在文化和科技領域的合作。最近由中國醫生組成的團隊更帶領塞爾維亞以中國模式對抗COVID-19疫情。但是，這些變化並沒有特別影響居住在塞爾維亞的華裔移民的地位，因為塞爾維亞人並不認為這些企業家和中國可以劃上等號。此外，新的移民和流動讓塞爾維亞來了新一波中國移民，他們反而在賽爾維亞成為中國形象的代言人。

中國的投資掀起了新一波移民潮，包括勞動者和中高階管理人員在內的限期移民。儘管這些建設獲得許多宣傳，但這些新的華人社群卻生活在大眾視線之外，大多居住在偏遠建築工地附近。這是第一次有這麼多數量的中國建築工根據州際協議移民到歐洲國家，這顯示出歐洲的中國勞工有很大的轉變，其過去通常為非法或地下的餐飲業或服飾業。

在2017年建立了雙邊免簽後，塞爾維亞的第二波中國移民潮是基於流動而不是移民，造成大量中國遊客湧入，據報導，這些遊客屬於中國中上層階級，由於人數眾多，塞爾維亞和中國警察甚至聯合組成了警察巡邏點。塞爾維亞與塞浦路斯、其他西巴爾幹國家一起，在2019年成為中國遊客人數增長最快的歐洲國家之一。旅遊業的增長與東歐其他地區的趨勢很類似。然而，這波旅遊潮並未伴隨像在匈牙利或葡萄牙等國一樣有著因追求生活風格而來中產階級移民，這可能是因為塞爾維亞並不屬於歐盟。

> 朝向一個共同的未來

針對上述最新的發展，目前仍沒有廣泛的研究。儘管如此，媒體和八卦軼聞則透露了塞爾維亞人對這兩個新群體的反應不同。一方面，後者是受到歡迎的——具有商業頭腦的人看到了越來越多相對富裕的中國人到來是一個機會，試圖調整或建立可以滿足其特定需求的服務，並在這方面或多或少獲得了成功。在塞爾維亞的每個主要旅遊點，我們都可以發現這點為該國帶來潛在的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在塞爾維亞高失業率的背景下，那些在中國投資計劃下工作的人被視為是潛在的威脅。然而，也有出現跨族群的友誼、以及當地社群與中國工人之間緊密連結的零星故事。這種新型中國移民與在地社群的關係可能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發展，未來將可以進一步密切觀察。

至於在二十一世紀初就在塞爾維亞生活的中國人，他們的情況並沒有受到上述地緣政治和雙邊關係變化的影響，但他們有著新的機會。一些人認為這兩個新群體的到來是擴展事業的機會，可以向工地提供中餐和商品，或是在旅遊景點附近開設中餐館和珍珠奶茶店。有些人利用自己作為「在地人」的身份，向企業提供如何實施計畫的建議，或向代辦建議如何規劃行程。與這些新移民相比，第一波移民的中國人最初可能屬於較低的社會經濟階層–不可否認，他們來自於經濟尚未起飛的中國。但今天他們可以運用自己的在地知識和經驗，成為新一波中國移民嚮望的對象。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也可以向塞爾維亞人提供跨文化的見解，這樣一來，在當地居民眼中，他們的地位也許可能有所改變。

這些不同的華裔移民群體之間的動態關係，以及他們與在地社區的關係反映了全球政治經濟變化的軌跡。受到民粹主義和公共衛生等多變因素的強烈影響下，新的移民挑戰了既有的邊界和階層，重塑了不同群體間的關係和地位。考量到在塞爾維亞對於中國人有著多元的看法、以及對於兩國之間關係的認識有所改變，這些都將促使移民的地位可能往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也為未來的移民奠定了基礎。■

來信寄至：
Jelena Gledić <jelenagledic@gmail.com>

> 華裔移民與 COVID-19大流行

Martina Bofulin, 科學藝術學院研究中心(ZRC SAZU)，斯洛維尼亞

奧地利維也納的塗鴉。2020年3月。Sebastjan Jemec 攝。

> COVID-19大流行與種族主義

在2020年初爆發SARS-CoV-2後不久，與對中國人的偏見、種族主義和暴力行為有關的報導數量，在全球急遽增加[1]。在一般民眾及政府官員對中國人產生的恐懼和種族主義的影響之下，中國人可能在路上受到責罵甚至襲擊，就連他們的商店和餐館都遭到破壞。

受這些攻擊影響最大的，是居住在歐洲的中國小企業家，他們的合法居留權通常取決於其經濟活動；而他們也僅僅因為中國人的身份，生意就馬上蒙受損失。這類小企業家大多是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的「出國熱」期間離開中國的；他們有些來自浙江或福建省，也有些來自中國的城市和東北地區。數十年來，他們已經很好的融入到定居國家中，通常經營蓬勃發展的批發進口公司(主要在東歐和中歐)、小型服裝企業(在義大利和西班牙)以及中餐館。雖然他們在個人的社交、或是與政府機構的互動中受到言語辱罵，並被投以偏見，但他們大多感到安全，且已經習慣於這類歧視。他們也因此常被稱為「看不見的少數民族」(invisible minority)，甚少出現在歐洲種族主義的相關討論中。

在病毒傳播到歐洲後的數週內，華裔小企業家的營業額和餐館顧客數量立即下降，更有些商店遭到破壞(如義大利)。搭公車或看醫生(德國、意大利和斯洛維尼亞)時，人們會和他們保持很遠的距離；他們甚至因為戴口罩被嘲諷和毆打(在義大利、荷蘭和英國)，甚至被指控蓄

>>

意囤積口罩以獲取暴利，但他們只是為了保護自己（斯洛維尼亞）。不僅是華裔居民，所有具有亞洲面孔的人，無論他們最近去過亞洲旅遊，還是從沒去過亞洲，都會被這樣對待。

> 反抗行動

這些可怕的排擠行為在許多國家都受到抵制。例如在義大利，幼時即從浙江移居至此的 Massimiliano Martigli Jiang 在社群媒體上發起抗議活動，他在佛羅倫斯的主要旅遊景點前舉著自己的照片，上面寫著：「我不是病毒，我是人。放下你的偏見。」在瑞典，韓裔瑞典藝術家 Lisa Wool-Rim Sjöblom 畫了一幅大流行期間亞洲人受到排擠的漫畫；義大利藝術家 Laika 則以街頭藝術的方式，描繪流行病與種族主義對羅馬的亞洲人造成影響。 至此，COVID-19帶來的種族主義，促進了有關系統／人際種族主義的討論，也促成了歐洲有色人種與亞洲新移民的抗議行動。

> 雙邊排斥

雖然海外華裔移民受到種族歧視的現象，在許多媒體以及維基百科中已經有充分的記載，然而關於他們返回中國後遭受的排斥，卻較少被提及。中國政府在2020年3月宣布無本土疫情後，便開始密切關注境外移入病例。他們迅速採取了各種措施來遏制傳播，而中國大使館、海外華僑組織和移民代表則呼籲移民不要返回中國。旅外僑民的回流對於中國遏制病毒的措施帶來負面影響，也威脅到中國政府抗疫成功的論述。

由政府所發起的境外移入威脅論述，在社群媒體上逐漸擴散；許多網民在網路上叫回國的移民「從哪兒來哪兒去」，譴責他們像巨嬰[2] 一樣，「建設家鄉你不行，千里投毒第一名」。最終，國家主流媒體決定將論述導向強調海外華僑的貢獻，並抑制網路上的仇恨言論。由這些針對海外僑民的言論，可以觀察出他們在中國國家論述中所扮演的角色有所變化。過去四十年來，這些人曾被視為讓祖國現代化程度增加的愛國者，如今此一地位似乎已不再存在。

面臨原生地和居住地人民的排斥後，許多人還受到來自其所屬群體（親戚、朋友和同胞）的污名化。在來自中國傳統僑鄉的小型企業家中，尤其是在浙江省的青田縣，污名化尤其明顯。這些移民和他們的親戚、朋友之間有著緊密的社會網絡，而這使得他們與世界各地以及自己的家鄉——中國東部山區都有所連結。

華僑媒體詳細報導了一起案例，指出歐洲第一批華人新冠肺炎患者的家屬不僅受到了惡毒謠言的攻擊，還受到了來自同胞的威脅。他們的家庭成員認為，自己已經盡其所能採取負責任的行動，並遏制病毒的傳播，卻仍然被指控危及其他移民的生命和生意。這一消息不僅在華僑社群中廣泛傳播，而且還立即傳播到了他的原生地，使他在青田的家庭留下污名。

由此可見，這次的COVID大流行，顯示排斥和偏見仍是華僑很可能面臨的經歷，從僑居國到移民過程中隨處可見。此外，還有一種新的歧視是針對在中國的華僑。大體來說，這也凸顯了將移民者和病毒連結的想像，這種想像將移動本身的概念，區分為受歡迎的和不受歡迎的。■

來信寄至：
Martina Bofulin <martina.bofulin@zrc-sazu.si>

1.https://www.euractiv.com/section/global-europe/news/covid-19-crisis-triggers-eu-racism-against-asians-rights-agency-says

2.「巨嬰」一詞出自心理學家吳志巨集的《巨嬰之國》一書，他在書中批評了中國年輕人的個人發展。這個詞在網上經常用來形容要求苛刻、傲慢的人。

> 極右政權的比較分析

Walden Bello,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 美國

COVID-19 的大流行引起了一波思想熱潮，人們開始討論：如何從左派的思想出發，以更進步的路線重組社會？在遍及全球的線上研討會中，我們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方案，包含復興的左翼凱因斯主義、去增長、去全球化、生態女性主義、糧食主權、解放的馬克思主義，以及「美好生活（Buen Vivir）」的概念。

唯一的問題在於，這些看似美好的想法在政治上難以被廣泛接受，即便是目前的主流典範——民主新自由主義經濟，也面臨了更深層的危機，甚至如同 Dani Rodrik 描述的那樣，正逐漸走向消亡。

在政治光譜的另一頭，不管是保守派或是極右派，都沒有發展出什麼創新的想法；就算有一些像是去全球化這種新奇思想，也是從左派偷來的。如今，極右派的聲勢壯大，而 COVID-19 帶來的變動，更可能加強這股勢力。

前半個世紀中最令人驚訝的兩個事件，其中之一是極右勢力在全球崛起，另一個則是二十世紀末十年，東歐和蘇聯社會主義政權的崩潰。

2010年時，除匈牙利以外，全世界沒有任何可以被稱為「新極右派」的政權。如今，極右翼人士已經在七個最大的民主國家中掌握了四個政權，包括印度、美國、巴西和菲律賓。雖然這些政權並未結盟，其國家的選舉結果卻時常有重大的影響力，促使政治傾向朝右派移轉。德國、丹麥和義大利等國便是很好的例子。

右派政權已在全球南方與北方逐漸掌握權力。這些統治集團當然有一些共同的特徵，卻也因其在全球政治經濟體系的不同位置，而有著各自的特殊性。為了方便分析，我們應將這些政權分開來討論，並注意到影響這些政權起源和變動的因素，不是只有全球政治經濟的位置而已。

> 全球北方的極右派

極右政權崛起的背後有哪些原因，其政權特性又何以構成？

首先，新自由主義政策對人們的生活條件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而歐洲和美國的極右勢力懂得利用這點。社會民主黨或那些中間偏左的勢力，參與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這導致很多選民不再信任社會民主黨，認為社民黨無法給予自身相應的保障措施，也因此而更容易受到右派勢力的利誘。右派很聰明地拋棄了中間偏右人士對於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全盤支持，並投機地選擇以左派擁護的「福利主義」為主要立場。

其次，在歐洲的極右勢力，則利用民主制度的爭議，來激起民眾對歐盟的不滿；他們聲稱歐盟的技術官僚領導階層並非經由選舉產生，其勢力卻凌駕於經過民選的成員國領導者之上。因此，當「三駕車」在2015年時罔顧公投結果，強迫

>>

「無論是保守派還是極右翼都沒有任何真正創新的想法，他們的許多有趣想法，比如去全球化，都是從左翼剽竊來的。然而，極右翼正站在政治勢頭上。」

對希臘實行緊縮計劃時，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 Marine Le Pen 便以民主黨人的身份聲明：「我們只有兩個選擇：不是民主，就是歐洲獨裁。」

第三，極右政黨一直以來都在移民議題上有著主導地位，幾乎所有人都支持他們的觀點。他們不僅指責中間右派和中間左派在移民問題上沒有可行的政策，還提出了一種陰謀論，認為中間右派、中間左派與歐盟，已經與所謂的「移民大軍」串通，正打算顛覆歐美社會。

反對移民，以及確保白人社會能統治少數族群，是極右派推廣與動員的核心價值；其以種族主義作為整體架構，並投機地將自身的立場定位於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義、親民主之中。舉法國 Marine Le Pen 領導的國民陣線為例，他們在幾十年前還反對各種形式的累進稅制，如今卻正呼籲要恢復財富稅。正如經濟學家 Thomas Piketty 所述，這是該黨「社會轉向」的過程之一，藉由對富者增稅，以表態政黨對工人社會保護體系的支持。在匈牙利，Viktor Orbán 領導的青民盟也擴張了家庭福利，並為失業者創造了補貼就業機會。極右派領導人認為，只要受益者是擁有「正確」膚色、文化和血統的人，設立特定的措施以保障社會福利、就業機會與經濟處境都是好的。當然極右派可能沒有明確地這樣表示，但他們的確呈現出這樣的觀點。至少到目前為止，這樣的立場在選舉與政治上，都是很有效的。

> 全球南方的極右派

接下來是南半球的情況。與北半球相同的是，新自由主義的結構性變化，使得民主國家中多數公民的生存環境，變得比原本還要更糟；在菲律賓、印度和巴西等地的問題更為深遠——人們從根本上排斥自由民主。菲律賓的 Rodrigo Duterte、印度的 Narendra Modi 和巴西的 Jair Bolsonaro 等人的政權，正反映出這樣的風潮：Duterte 在數千人的現場主持法外處決，並驕傲地聲稱自己違反了正當程序，Modi 則為印度正日漸衰落的的世俗化和多樣化處境而自豪，Bolsonaro 則率領人們重返曾經統治巴西20年的軍事獨裁政治。

在這三個社會中，公民和自由民主間的疏離，主要來自於自由民主承諾與現實的巨大鴻溝。印度憲法、1987年的菲律賓憲法和1988年的巴西憲法所描述的那套光榮理想，與現實世界裡的大規模貧困、不平等和權力剝奪差距之大，早就註定公眾的不滿將在某天被引爆。

要理解極右勢力的崛起，就必須討論到中產階級的理想破滅。在20世紀的最後三十年裡，中產階級是全球南方獨裁統治皆曾被推翻的核心因素；然而過去二十年中，自由民主並未兌現其承諾，中產階級的生活水平不升反降，使他們大失所望。他們轉而對更激烈的政治方案抱持期待、甚至開始支持新自由主義，雖然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帶來的成果有好有壞。這些政策侵蝕了一部分中產階級的生活條件，卻也同時惠及一些下層階級的人，形成了所謂的「充滿野心的中產階級（aspirational middle class）」——也就是那些在收入上不是中產階級，卻渴望成為中產階級的人。為了迎合後者，Modi 與 Duterte、Bolsonaro 已經接受了新自由主義作為政策的一部分。相較於此，全球南方的極右政權則因機會主義的考量，而與新自由主義保持著一定的距離。

由於不平等和貧困猖獗，許多人轉向毒品與犯罪事業；對於犯罪和所謂「危險階級」的恐懼心理，也在此情況下被加強，成為中產階級向右派靠攏的原因之一。中產階級對犯罪和毒品的恐懼，無疑是巴西和菲律賓選舉結果的核心因素。Duterte 手段高超，他將毒品和犯罪問題，與人民的社會背景分離，並將其形塑成一個所有階層——不管是富人、中產階級或窮人——都共同面臨的主要問題。

>>

反貪腐的立場同樣對人民——不僅是中產階級——有著強大的吸引力。「趕跑貪污者」的競選主軸提供了選舉活動動能。每個打著反貪腐訴求的政黨，都在上台之後變得同樣腐敗；人們因此而對選舉活動感到憤世嫉俗，並被 Modi 和 Duterte 這樣的領導人吸引。民眾也許和這些候選人在許多觀點上不同，甚至認為 Duterte 會損害人敏的政治權，但他們能夠展現清廉的形象——即便現實可能並非如此。

在巴西，大量選民支持 Bolsonaro 是為了懲罰工人黨領導層的腐敗。雖然所有政黨都有腐敗行為，但 Lula 的政黨成為了眾矢之的；這也許是因為工人黨在上任前曾以自身的清廉為賣點，卻在掌權後成為腐敗的政府。事實上，前幾任政府的腐敗程度，和 Lula 與他的繼任者 Dilma Rousseff 相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比起毫不掩飾的惡行，偽善的代價反而更加龐大。

Duterte 和 Modi 在工人階級、農民、城市和農村的窮人間，也同樣享有廣泛的支持，是不爭的事實。不過下層階級對這些領導者的支持程度與原因，或許與中產階級有所不同。借 Antonio Gramsci 的話來說，相較於中產階級可能呈現於電視、網際網路和平面媒體上的觀點——也就是「主動共識」，下層階級更常以「被動共識」的模式為主。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一直是輿論的主導者，在印度和菲律賓，有很大一部分這個階層的人，便是 Duterte 和 Modi 的支持者。

最後，我們也必續將這些極右人物的魅力納入討論，才能更好地理解他們的成功。Modi 和 Duterte 正是極具魅力的人物，不管他們說什麼、做什麼，似乎都能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與容忍，這是難以用理性演算、階級和政治恩惠（patronage）去解釋的。和這兩者相比，在全球北方，沒有任何極右派人士能和他們一樣，擁有如此龐大且全面的吸引力。不過在2020年的選舉中，有超過七千四百萬的美國人把票投給川普，比他在2016年獲得的選票還多出了一千一百萬張——這恰恰證明，川普的確有著能緊緊抓住政黨與選民的超凡魅力。

> 結語

全球南方與北方的極右派政權確實有一些共同的特性，這篇文章則探究了兩者之間的差異。極右派在當前全球規模的政治中，發展出了超越中間左派的政治聲勢——本文旨在為這樣的現象，提供更加完善、深入的解釋。■

來信寄至：
Walden Bello <waldenbello@yahoo.com>

> 拉丁美洲社會學的普世目標

Esteban Torre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órdoba-CONICET, 阿根廷

〈全球對話〉的這一部分將提供一些拉丁美洲著名作者的創新理論、知識路線和未來研究計畫。這些在共同行業中工作的人們每天都致力於建立新的理論工具，以便全面研究拉丁美洲的社會實體，甚至在某些情況下還擴及整個世界社會。在肯認本節作者們各自國族身份的同時，他們皆認為還有一個實質性的拉丁美洲身份，並在他們的研究計畫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也代表他們同時培育了針對區域、世界社會未來的知性貢獻。絕大多數的客座作者都提出了一次更新、一場結構改革，或簡單來說，一場針對當今世界社會學的革命。沒有人願意抑制自己的創造力，且所有人對於只是成為他人思想複製者的前景感到恐懼。他們每一位都針對區域和世界社會科學的現狀、該領域所面臨理論上和政治上的挑戰、知識的生產如何因應社會變遷過程向未來發展，提出自己的見解。

這群社會學家，純粹憑著其努力工作和才華，便在他們各自的國家、地區中脫穎而出，甚至也在西方世界不斷增加其影響力。他們各個都懷有非凡的志向，這點十分可貴。他們在研究上堅定付出，紛紛從新的社會理論出發。每一位作者都受到不同的啟發，從不同研究對象、研究方向，到來自他們原始研究、理論創造和社會學變革目標中的研究問題。而在意識形態認同、規範性的解決方案、政治立場上，他們也存在差異。在這方面，多樣性的聚合確認了一件事：在拉丁美洲，針對歷史當前的重大問題，作者們可以藉由在地化的閱讀來創造自己的思想，並在他們自行產生的解釋性社會理論中向前推進，最終為他們各自的社群規劃具有視野的期望指標。

然而，這個段落中的所有差異都屬於一個共同的、令人興奮的抱負，這個抱負建構了每一個倡議，並源自拉丁美洲最光明的歷史。每個思想脈絡都建立在強力拒絕任何區域自給自足、拒絕在理論上將拉丁美洲視為次要等原則的基礎之上。每位作者都視他們的拉丁美洲認同和生長脈絡為一種正面、獨特的價值，協助他們在世界舞台上彰顯獨立自主，而不是在世界社會中進行思考和行動的限制。少了這一股共同的、受源自於區域歷史的各種解放性傳統所影響產生的欣賞和感激之心，就無法解釋這裡伴隨著信念、力量和獨創性的思想脈絡。

我要提及的最後一件事是，本段落中絕大多數作者都參與了拉丁美洲社會學會(Consejo Latinoamericano de Ciencias Sociales, CLACSO)的一個工作小組「社會理論與拉丁美洲現實(Teoría social y realidad latinoamericana)」。我們創造了這個跨國的集體空間，召集了約40名研究人員，目前由Jose Mauricio Domingues和我本人進行協調，旨在克服拉丁美洲社會學和社會科學領域現階段產出自主性理論的缺乏。為了進一步推動這項願景，很重要的一點是在不同國家和區域板塊之間，建立一個世界社會學的平等理論對話。〈全球對話〉的共同編輯Klaus Dörre慷慨地邀請、開創這一個拉丁美洲段落，便是個很好的例子，說明了在這個歷史時刻，我們迫切需要一種新的全球化在地化(mundialization)精神。

來信寄至：
Esteban Torres
<esteban.torres@unc.edu.ar>

> 世界典範：一個社會學的新提案

Esteban Torres,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Córdoba-CONICET, 阿根廷

從二十一世紀初開始，世界上主要的社會變遷正在窮盡兩個典範。這兩個典範從其起源一直到今天，持續左右著社會學的發展，它們分別為：現代典範和反現代的後現代典範。這項議題引起關於典範轉移的討論。我則是提出一種新的、具有科學思想的後現代方案，稱為「世界典範」(world paradigm, WP；西班牙語為paradigma mundialista或PM)[1]。這個學術系統承載著關於世界社會、世界社會變革和世界社會學的新觀念。我將在這裡回顧其中一些要素。

> COVID-19盛行下的全球在地化

拉丁美洲社會學的關鍵變化，是針對兩種同時發生的危機的反應：(1)持續加重的新自由主義危機，和(2)逐漸萌芽的、社會學和歷史社會本身所構想的「社會」觀念的危機。第一種危機，在全世界的國家重新中央集權化(state recentralization)過程中加劇了；至於第二種，來自一個空前的精神上、知識上的全球在地化過程(process of mental and intellectual mundialization)。觀察拉丁美洲發現，上述的國家、全球在地化兩種危機，隨著各種因素而日益嚴峻，包括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拉丁美洲最後一波從下而上的區域一體化浪潮(2003-2015年)，以及當前的COVID-19大流行。如果新自由主義危機對反現代的後現代典範產生負面影響、對現代典範產生正面影響，同時「社會」觀念的危機對兩者都產生負面影響(儘管對現代典範的影響更具決定性)的話，有鑑於後者的新穎和它在社會決定論方面的潛力，我會將關注重點放在後者。

COVID-19大流行是一重大事件，它高度加速了人類歷史上首次精神、知識全球在地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內含至少三個核心元素：一、一個統一世界社會的初步構想，並完善地整合了國家、地區和全球範圍。二、紀錄國家和地區之間的不平等事實存在。三、一種直覺或佐證，認為世界社會不僅只是現代的或「仍在現代化的過程中」。

上述的全球在地化過程顯示現代、後現代的反現代典範日漸衰落。眾所皆知，兩者都是從社會學以民族社會為參考框架的前提出發。且不僅只是任何一種民族社會的思想，而是一種帶有自覺的、拘束性的視野，它伴隨著意識形態上的變化，已經從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始，從北半球傳播。它最完善的版本，將民族社會的思想包裝在一種滲透性和反思性的普遍主義中，並促進

>>

「COVID-19大流行是一重大事件，它高度加速了人類歷史上首次精神、知識全球在地化的過程。」

周邊國家的學術界進行大規模同化，以使其歷史社會獲得價值。現代、後現代典範中存在著不同種類的方法論、認識論和民族主義理論。如今，世界社會學中來自西方的多數全球化理論都處於這種拘束性的框架之內。

上述現代、後現代的反現代兩種典範的日漸不足，不僅只在先前提到的兩種危機中發現而已。它也明顯呈現在1980年代起，拉丁美洲社會學結構重組的歷史過程中，某種程度上世界社會學也是。這個重組和下列因素有關：社會學和非關學術的政治實踐之間實質的脫節，以及社會學實踐中科學、批判、政治三大動力之間學術上的脫節。這個脫鉤(decoupling)的過程加劇了世界社會學的科學分解(scientific decomposition)和政治無能(political impotence)，同時縮減了政治行為者可利用的學術知識資源。

> 世界典範的科學計畫

面對這種情況，進步派和左派社會學需要恢復其現代核心，同時超越它，走向新的世界典範。世界典範引入了一種社會學概念，即作為一種面向世界社會轉型的本地化、多重本地化社會科學力量。這個典範旨在創建一個新的後現代科學計畫，提出將科學、批判與政治核心重新連結的社會學理論與研究模型，並為社會學與政治學實踐提供新的中介。我會著重於WP的第一個要素：科學計畫，其由全球在地化原則、本土化原則和歷史化原則[2]的辯證關係之中開展。全球在地化原則預設了社會是以世界為基底，而不是國家。這個前提的革命性，在於其翻轉了現代和後現代的反現代典範之間的空間核方程(nuclear spatial equation)。全球在地化原則使我們得以框架出一個概念——世界社會是發生於以下三個系統層級互動之間的最高單位：(1)國際、地區、全球領域之間的關係，被視為是不可分割、不可簡化的範圍；(2)中心—邊緣的關係；以及(3)現代與後現代之間的關係。

在地化原則強調，思考世界社會時，應考量到在地化的重要性。對世界典範來說，世界社會是一個不平衡的社會形式，其同時有著在地化和多重在地化的性質。每個在地化的節點，都是前述三個層級之間的不對稱互動中，直接或間接的單點凝聚。就如同世界社會並非單一地區在地化的成果，一個社會結構轉變的完整願景、全球範圍的社會改革，也不能只是單點開花。這即是我們發起結構性的運動與計畫，需要提倡「世界社會學」的創建；其能夠將關於我們身處星球的、各種歷史在地化性質的世界社會理論連結起來。■

來信寄至：
Esteban Torres
<esteban.torres@unc.edu.ar>

1. 欲知此提案的詳細發展，請參見Torres, E. (2021) *La gran transformación de la sociología* [偉大社會學翻譯]. Córdoba-Buenos Aires: FCS-CLACSO. 手稿已提交出版。

2. 由於空間因素，以及這兩者是最具破壞性的元素，我們指得特別是前兩個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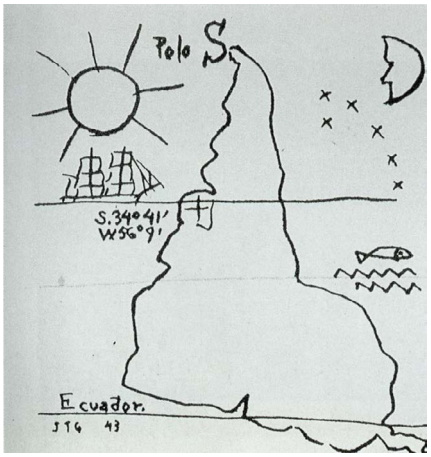
> 連結全球社會學和全球現代性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IESP-UERJ，巴西

政治社會學在拉丁美洲具有深厚的傳統。它一直是拉丁美洲社會學的核心部分，雖然一定不是唯一的(「文化」也很重要，以及一些較早的政治經濟學開端)。政治社會學，隨著特定學科(如政治學)的出現，而得以擴大和轉型，其北美風貌也與先前更以社會為根基的社會學敘述形成對比。政治社會學產生了重要的理論見解，但如同拉丁美洲的常見情況，未能達成更廣泛與全面的理論貢獻目標。具體而言，現代性在特定政治維度上的特定發展，雖然被討論和概念化，但通常分析只停留在區域層級。

> 社會理論的缺席

其中一個例子是 Quijano 以馬克思的「產業後備軍(industrial reserve army)」概念，討論為何拉丁美洲有如此多過剩勞動力，並產生了他所謂的「邊際極點(marginal pole)」。在某個時間點，Quijano 意識到這個問題可能也出現在19世紀的歐洲，而移民解決了當時的問題。但他不敢更進一步(更不用說挑戰馬克思的一些想法了)。這位日耳曼人對「民粹主義(populism)」的討論也是如此，他認為當現代化使群眾「可以被利用」時，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民主政治制度吸收，所以投機的菁英便得以進行「操縱」。這本來可能指向對歐洲的進一步反思，但是日耳曼人(為了逃離法西斯主義從意大利移民到阿根廷)卻將他的討論限縮於只針對阿根廷，並在後來隨同其他作者，將他的討論範圍延伸至整個拉丁美洲。他們都只到這裡就停下來了。由 Pablo González Casanova 和 Rodolfo Stavenhagen 提出的「內部殖民主義(internal colonialism)」概念，直指現代、後殖民國家對原住民社區的侵犯，這本來可以提供一個對現代國家的大致描繪——因為實際上，其他地方也是以這種方式發展而來的。然而，他們卻沒有得出這個結論。Florestan Fernandes 甚至認為我們無法進行任何理論研究，因為缺乏專業的人才和資源，以及缺乏更迫切、具體的問題。



這幅畫是烏拉圭西班牙藝術家 Joaquín Torres García(1943)的水墨畫《América Invertida》。反向的拉丁美洲大陸是對南美藝術強烈自信的描繪。
來源：創用CC。

拉丁美洲社會學，乃至整個拉丁美洲社會科學，長期苦於缺乏理論化。或許這點目前更傾向於是一種全球現象，但拉丁美洲本身過往的限制也一併被混進這個問題當中。在納入關於研究策略的討論、理論和經驗現實之間的關係之後，這個問題變得更加複雜。我們應該先從特定的角度出發，再邁向普遍的程度嗎？還是有必要－在拉丁美洲也是－先從屬於這個次大陸和其他全球現代地區的一般理論問題下手？幾十年前，Leopoldo Zea 觀察到當歐洲人(和北美人)視他們的普遍性為理所當然，並視他們的特殊為立即在概念上可概括的時，拉丁美洲人反而必須從他們的特殊起步，因為他們的普通性原則上是被否認的。

>>

> 政治現代性理論

如果過去是如此，那麼它便不再適用於現在。儘管現代性和它的起源尚存在爭議，但現在已經沒有人會認為西方的普遍性是現代性的主體了。有些人會談到殖民和後殖民現代性、交織現代性、多重現代性等。此外，包括拉丁美洲在內，到處都有知識的積累，也包含理論知識，這使我們可以從最高層次的理論下手。對拉丁美洲、歐洲、非洲、美國和亞洲而言，情況都是如此。不可否認地，我們需要對脈絡敏感，但是問題在於我們的脈絡是（或應該要是）全球的。如果我們不堅守在某個特定地方出生和／或繁殖的直接經驗的話——反正整體而言，這也不是社會科學的好策略——這當然就應該是現在的情況。

這即是我的社會學研究正努力的方向。受拉丁美洲思想和某種「歷史唯物論」影響，我決定修正有關「結構與能動性」的論辯，並重新思考社會生活中的持久與變動性。我由此得出了「集體主體性」和「社會創造性」的理論，其中納入創新的與歷史的觀點。我深入地探討現代性主要的想像性與制度性元素，接著將主軸拉回拉丁美洲的現實，以「現代性的第三階段」的概念對其進行分析。接下來，我將討論延伸至全球現代性在全世界的擴張，以及其單一性、異質性和混合性。最後，我講述自己現在所認為的，文明與解放議題的戰略性定位：現代性的政治層面。同時，我也認為是時候研究我關注已久的議題——馬克思的「闡述方法」，並將其應用至政治層面的討論。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進一步的調查，並系統性地組織範疇，才能完整地討論政治現代性、建立其動態趨勢。

這促使我以批判理論的途徑，提出一個擴及全球的政治現代性範疇闡述。我曾經試圖統整各地的歷史發展，然而真正重要的是要將這些發展納入範疇分析系統。我的分析處理了想像與制度是如何開展，以及這個趨勢從何種機制中產生並運作。權利形式、公民形式、法律、國家、自治、政治體系和政治政權，以及可想象的激進民主、抽象與具體的關系、自由主義的擴張與限制，這些都構成了我持續發展的理論方法核心。除了這些範疇之外，與增強國家與公民自治有關的認同、分析、解釋與預測，也都涵蓋在其中。我最近在研究「真正的社會主義」，並定義其為「專制的集體主義」——雖然不是社會主義，卻是一種寄生於現代性的獨創社會形式。

關於此一現代性的整體理論性詮釋，已經有一些著作發表；而我打算在接下來的幾年內，對政治現代性做出最終的、更完善的理論描述。前述在理論與價值論上的野心，雖然因其拉丁美洲的背景，而受到普遍主義者的揚棄，卻仍是全球社會學研究取逕的重要部分。■

來信寄至：
José Maurício Domingues
<jmdomingues@iesp.uerj.br>

> 將理論歷史化：給拉丁美洲的提案

Viviane Brachet-Márquez, El Colegio de México, 墨西哥

1810年至1860年間發生了重大的領土變化：八個國家誕生（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薩爾瓦多、厄瓜多、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巴拉圭、烏拉圭），墨西哥的北部領土被美國占領。
來源：創用CC。

過去，中央國家（相對於外圍）所實踐的社會理論一直是靜態的，亦即將社會秩序視為缺乏廣泛衝突，並將衝突視為失序的一項指標。它還嘗試透過假設性演繹推理（hypothetical-deductive reasoning）來預測穩定的社會持續性，從而變得更加「科學」。甚至正當社會學之父們經歷著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劇烈轉變時，他們也將這項轉變描繪成一個缺乏理論化的過程，有著固定的出發點和到達點：即從社區（Gemeinschaft）到社會（Gesellschaft）。

基於這種一般模型，拉丁美洲國家便顯得既不完善又尚未完成，它們不是從「傳統」邁向「現代」，就是從未開發（或發達不足、開發中）邁向更接近「已開發」。這項轉變「之間（in between）」的歷史過程得到了廣泛描述，但整體而言卻沒有被理論化[1]。這樣的結局，在任何情況下，永遠是拉丁美洲基於世界市場的力量（或帝國主義、殖民主義）而不完美、不均勻地「發展」了起來，而人們自獨立後兩世紀以來，在建立社會秩序時所扮演的角色，則僅有微小的影響。

> 拉丁美洲社會秩序歷史建構

我有一個提案，也就是拉丁美洲作為一個區域，可以被豐富地理論化，只要我們認知到拉丁美洲的歷史性，並從以下前提開始進行：社會秩序，無論在任何地理環境，都是極其複雜的、歷史建構的、不定的社會過程的產物。分析拉丁美洲社會秩序時，核心問題需要關注和歷史上政治系統有關的行動者，由此產生以下問題：（1）行動者是誰、是為了誰的利益（個體、父權家庭、原住民社群或資本家獲益的利益最大化）；和（2）由什麼動態原則驅動（系統性、機械式或行動者）。這些問題的答案取決於何種理論視角可以將19個拉丁美洲國家的集合變得可以系統性對話、而不是毫無關聯的案例。

在這篇簡短的文章中，我只能概略地摘述我在這方面的工作，如何有助於回答這些問題[2]。一般的理論論點可以總結如下：拉丁美洲歷史上所產生的是一系列受限於時空（spatio-temporally limited）的社會秩序，這些社會秩序由彼此混合、經常相互矛盾的規則、規範和符號所組成，它們不是成為霸權（hegemonic），就是不再被廣泛共享或強制執行。換言之，這個社會過程的一些特定結果，可能已經反過來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ed）和重新制度化（re-institutionalized）了，同

>>

時這裡作為國際地緣政治、市場競爭過程的一部分，也面臨著外國和世界企業的入侵。

從這個角度來看，牽動拉丁美洲獨立後歷史的是政治系統裡不同行動者之間的交互衝突和合作，他們意圖強化菁英們的財富、權威和權力，這些菁英則與政治體系霸權在不同時間/地點有密切關聯。發揮影響的還有從屬群體（subaltern groups）對標記自己日常生活的事件的反應方式，其反應又反過來強化或修改了這些過程。圖1抽像地呈現了這些歷史發展，其中可列舉出相對應的經驗事實，因為它們不只發生在本地區的不同國家，還共享了歷史上重複出現過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秩序。依此觀點，關鍵的政治系統內行動者，以及人民、社群和組織，每天都透過重製其生活和理解其經驗來建立社會秩序。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一樣，這些安排整體來說並沒有達成共識或平等，因而錯過或抵消了許多進步改變的機會。但這就是我們可以、也一定要進行理論化的現實情況，我們要擺脫以歐洲為中心的迷思，進行系統性研究。

為了以經驗方法探討這一整套過程，現正進行的研究將聚焦於國家與其他系統性秩序、強力的社會團體、資本主義企業和外部國家，他們彼此在不同時間的關係為何，正如圖1所示。為了達到霸權，各國一直致力於主導它們的領土[3]、達成經濟自主，和捍衛其主權。在這麼做的同時，它們施加了所有可想的權力，以控制它們的人口；從積累體制（regimes of accumulation）中取走他們的份；並對更加強勢的外部勢力做出讓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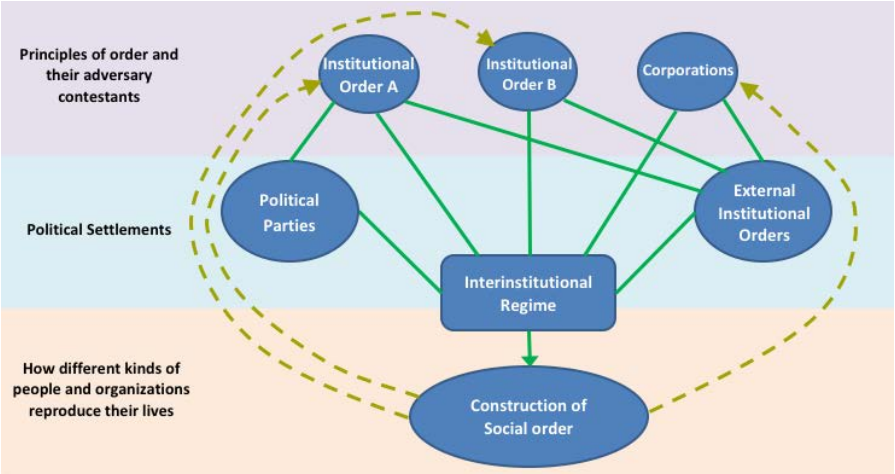


圖1。來源：Viviane Brachet-Marquez。

上述大致上為拉丁美洲各國扮演政治體系時採取的行動。儘管出自於獨立戰爭後的負債累累，且相較於天主教廷、大領地（latifundio）[4]或軍事力量，手中僅握有有限的權力和權威，同時不斷地受到來自經濟上和技術上較先進國家的干擾，拉丁美洲各國還是做到了。

> 結論

從這個角度檢視，從1810年以來拉丁美洲國家面臨的問題[5]，與從1500年代以來歐洲國家所經歷的那些問題[6]截然不同，然而兩者卻一再被比較，這些比較大多是不利且不合時宜的。通過採用這種研究方法，我們可以理論化拉丁美洲社會秩序的形成和失落，不是按照歐洲中心本位可能如何的普遍原則，而是以從1810年以來，在格蘭河（Rio Grande）[7]到火地群島（Tierra del Fuego）之間所創造、轉變和中斷的歷史動態當中，具可比性且考量歷史變化的實際案例。■

來信寄至：
Viviane Brachet-Márquez
<brachet@colmex.mx>

1.除了依賴和世界體系理論學者如Cardoso和Faletto、Wallerstein和Arrighi以及Boserup和Hirschman。
2.本書預計將於2021年7月完成，並於2022年以英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3.韋伯式的觀念，將國家作為一個實體，視為透過壟斷合法的暴力手段來統治其領土，在這裡被認為是歷史上的問題，而非定義上的問題。
4.Latifundio是西班牙語詞彙，指大型土地財產。
5.1810年5月標誌著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墨西哥的獨立戰爭開始。
6.比較僅限於英國、法國或普魯士，其餘24個歐洲國家則省略不談。
7.在1848年美國吞併墨西哥一半以上的領土後，格蘭河成為最北端的邊界。

> 相互依賴性的再思考

Sérgio Costa，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德國

2019年8月，巴西農村女性工人游行，巴西利亞。
來源：Renata C. Motta, FU Berlin。

>身負重任的社會學

自誕生以來，社會學就一直需要「證明自己」——人們總會質疑：社會學與其他類似的學科有什麼區別？其研究結果有什麼實用性？社會學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其能考量到背景脈絡，以及行動者在眾多現象中的意義，來對社會過程進行分析。正如我在《後殖民、去殖民、黑人批判：接合與裂縫》(Postcoloniality-Decoloniality-Black Critique: Joints and Fissures，Campus 2014年出版)一書中談到的：最近的社會變動與蓬勃的學術發展，逐漸為社會學帶來了挑戰，考驗其掌握結構與意義之間關係的能力。

首先，社會學中的研究傾向出現轉變，不是將主題的範圍限縮至結構(經濟主義)層面，就是將社會過程完全置於符號層面(文化主義)討論。在這兩種情況中，社會學的核心關懷，也就是由交錯的結構、意義與表徵共同形構的「社會」，卻好像被遺忘了；這和 Hans-Georg Soeffner 以及 Karl Lichtblau 等德國社會學家的描述是一致的。社會學陷於經濟／文化取向的掙扎，面臨了分析當代世界的挑戰——然而戰後社會學家所預想的現代社會模型，卻和現實中的完全不同。現代性在社會學中所對應的，是一個將秩序建立在安定的邊界，以及穩固身份認同上的世界：西方與非西方、女人與男人、原生與外來、現代與傳統、德國的／土耳其的與德國-土耳其的。

第二個轉變，與社會過程以及社會生命的全球化有關。社會學仍然缺乏一個足夠有效的理論工具，能以國族社會集合以外的形式去理解世界社會(world society)。再者，現代性的形塑也不再由西方國家

>>

主導。後殖民理論家曾強調，西方國家的主導地位，是構成社會學中現代性概念的根本元素；然而這種觀點是缺乏想像與深入理解的。舉例而言，寶萊塢、好萊塢和拉美肥皂劇(telenovelas)的交織可能促成21世紀的浪漫主義思潮；拉丁美洲也可能發展成中國的周邊國家之一。社會學試圖將國族社會學的觀點應用於其餘的未知世界地區，以探討全球的社會進程；社會因此被「世界社會」所取代，現代化則被「全球化」取代。這些新的概念雖然被應用在新的架構中，卻保留了舊有的國族特性。這導致社會學缺乏真正創新的研究發現，也難以觸及那些超出國族範疇的結構與意義之互動。

第三點，則是物種間的相互依賴(interdependence)。社會學成立於人類中心主義的鼎盛時期，並一直將人類社會視為利用周圍自然環境的集體存在。這與近三十年來後人類研究的學術關懷是互相矛盾的——即人類與非人類(包括植物、動物、精神和人工製品)之間，有著相互依賴的關係。我們與動、植物存在著各種互動關係，病毒與細菌甚至生存於人類體內；然而社會學傾向將社會與自然環境分開討論，忽視了人類與其餘生命形式之間緊密的關係網絡。這使得社會學不再能理解維生(vital)與致死(lethal)的過程，與之相關的物種相互依賴性也不受關注。正如凱瑟琳·普萊斯在《後數位化科學與教育(Postdigital Science and Education)》上發表的文章《當物種與數據相遇(When Species and Data Meet)》所言，在當前的 COVID-19大流行下，這樣的現象更加被凸顯出來。

> 拉丁美洲的貢獻

拉丁美洲的社會學傳統與發展出的各種思潮，為社會學提供了開創性的貢獻和反思，並能為其面臨的挑戰提供協助。

早在1950年代的拉丁美洲，就有學者開始關注結構、社會意義和表徵之間的關係。Rodolfo Stavenhagen、Florestan Fernandes、Heleieth Saffioti 等社會科學家，更是在社會科學出現「交織性」的概念之前，便試圖理解族群與階級、種族與階級、性別與階級如何交織，並構成人的社會所在(social places)，又如何影響其社會位置、自我表現形式與行動。在2008年出版的《全球糾纏不平等、概念辯論和來自拉丁美洲的證據》(Global Entangled inequality, Conceptual Debates and Evidence from Latin America)一書中，阿根廷社會學家 Elizabeth Jelin 也重新整理了相關論辯。

依賴學派與其分支學者，已經在「社會過程與社會生命的全球化」此一研究領域中向我們闡明，從過去的殖民與奴隸制度發展至近代的經濟資本主義模式、在不同的時間點與地區中，經濟結構和社會性模式如何互相影響。在2019年發表於《當代社會學》的《拉丁美洲現代性研究：譜系與困境》(The research on modernity in Latin America: lineage and dilemmas)一文中，我便討論了這個命題。

如何公平地處理物種間的相互依賴性議題，是社會學面臨的難題之一。然而拉丁美洲的學者，仍能從本土傳統的觀點出發，為此議題提供了豐富的理論概念，其中更有許多概念已經廣泛傳播於世界各地。例如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在其著作中提出的美洲印第安人視角主義以及美好生活(buen vivir)的概念，即在安第斯地區有深厚的發展。這些思想風潮多以描述分析或地球倫理學的觀點，去思考人與非人之間的相互依賴性。

這一系列的理論傳統與劇碼，將使得拉丁美洲的社會學，可能在接下來的社會學發展過程裡，扮演著關鍵的角色——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應致力研究相互依賴性的概念，並能涵蓋文章前述的不同層面。為了參與社會學的重新建構，拉丁美洲的社會學需要再次檢視這些學術傳統，並將其轉譯成能有效應用於當代理論辯證的形式。我們也要在學術、非學術，以及南方、北方社會學的知識生產者之間，創造對等的合作模式；拉丁美洲能夠在當代社會學的重建中，有多少規模和品質的貢獻，就取決於這些人將如何團結。■

來信寄至：
Sérgio Costa
<sergio.costa@fu-berlin.de>

> 危機的系統理論：忽視的時代

Aldo Mascareño，Centro de Estudios Públicos，智利

來源：Unsplash 網站的李林。

我近五年的研究重心，在於為這些複雜的社會危機，發展出一個系統性的理論。原因有二：首先，自法國大革命至今，危機仍然沒有從批判的概念中分離出來；其次是在批判理論中，危機與批判之間的差異，仍被視作其理論與政治實作的單位之一。事實上，系統理論系統性地避談危機這個概念。在魯曼的理解中，危機是現代社會的一種消極的自我表述；也因此，危機的運作機制一直是系統／社會環境關係之間被隱藏的價值；直到最近才開始出現針對批判性系統理論超現實可能性的反思。要注意的是，複雜的社會危機，仍是二十一世紀的標誌性特徵。

>現代社會的黑暗面

過去的二十年間，現代社會的黑暗面透過特定紛亂，以完全不同於上個世代的形式展現出來。這些被我們稱為「危機」的事件，在社會的變革下展現出前所未有的韌性、延展與週期性；我們在其中經歷的那些極為複雜的社會危機，更戲劇化地警示著我們：現代社會已經無法承載全球相互連結、多層次的觀點，也難以達成人們的期望。在全球現代性之下，在某地區發生的事情帶來的後果，卻要由其他地區的人們承受，世界各處都充斥著不滿和隔閡。在本文中，我將這段曲折的時期稱為「忽視的時代」。

世紀之初，伴隨著世界大戰、大屠殺和對於人權發展的期望，車諾比事件為新網絡化的後地方時代拉開了序幕。緊接著，動蕩的忽視世紀開始了。首先是雙子星大樓，作為現代性符號擴張與自我防衛特性的象徵，在象徵著大規模殺傷武器的飛機撞擊下倒塌，成為了開幕式的歡迎禮砲。再來則是新世紀的開端，過去的二十年內，倫敦、馬德里、尼斯、巴黎、波士頓發生了恐攻事件，中東、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則出現屠殺和違反人權的行為。除了家（home）以外，好像任何地方都是不安全的。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日益嚴重的氣候變遷、不斷擴張的宗教的基本教義派，以及跨意識形態的、強烈排外的民粹主義，都像是在告訴我們——即使是家鄉（home），也很容易成為受忽視的對象。

2008年的金融動蕩，顯然是網絡化忽視時代的系統性崩潰——全球的相互連結與結構同質程度過大，使得世界變得狹隘且快速，並造成人們注意到更多跨時空的規範性問題。各地的氣候變遷更加突然且劇烈，凸顯了這艘「地球飛船（spaceship Earth）」的相互連結性，也促使更多問題浮上

>>

「全球現代性面對著世界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人們經歷著不滿和隔閡，他們遭受著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的後果。我稱之為忽視的時代。」

檯面：永續性的國際協議到底是抱持著良好的政治意圖，又或是在規範性的約束力之下促成的決定？除此之外，基本教義派的領土與數量擴張，以及其與西方生活中心的連結，更是讓傳統國界的缺陷暴露於世；基本教義派在人權的煽動性論述中佔據突破口並成為議題的討論焦點，尤其在後物質時代對世界不抱期待的年輕人心中有著重要地位。從傳統左派的Chávez-Maduro 政權到右派的 Le Pen、川普、Bolsonaro等案例，我們也可以看到民粹主義利用了網絡化忽視時代的規範性破口，重新建立民族主義與仇外主義的論述，並試圖藉此將來自國家之外的影響與需求隔離在外。

> 關鍵過渡理論

對未來的歷史學家來說，2011年也許會是新現代性規範意識的起始點。當然，在2011這個時間點之前，事情就已經有了跡象；如2000年始於南斯拉夫、並接連在多個前蘇聯國家發動的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以及2005年發生在巴黎周邊地區的動亂。2011年起，更有一波反對忽視的社會運動浪潮蔓延全球——佔領華爾街、憤怒運動(Indignados)、中歐以及拉丁美洲的暴動、阿拉伯之春等行動，反映著各地人民溢於言表的不滿。過去幾年裡，中東到歐洲、中美洲到美國的大規模移民，以及因國家崩壞而從海地和委內瑞拉移民至拉丁美洲的人民，都是這種規範性耗竭的必然結果。總而言之，人們的動力不僅來自於生存動機，也來自對於規範性期望的實現——意即那些現代性一開始所承諾卻又忽視的期望。

我認為相較於其他取徑，社會系統理論在面對這類複雜事件時有更多優勢。第一，系統理論強調了自主性世界體系的出現，以及其時常有著超越人類可能性、國家規範的控制力。第二，這個理論指出自主性系統之間有著極高的相互依賴性，而「自主性」與「相互依賴性」的組合，可能會導致更多的衝突與矛盾。第三，社會系統理論也清楚指出，系統的運作是跨國的，整體區域極有可能因為自身的盲目，或是對於邊陲地區的忽視而體系崩潰。第四，系統理論向我們揭示了現今的社會可能隱含的問題：在更高的複雜性與風險之下，我們要面對的並不是如何「解決」問題，而是如何生存於問題之下並與之共處。

在這份研究中，我提供了一個取徑，使我們得以理解數十年來，在複雜的社會系統中出現的危機，並揭示其韌性、延展性與週期性。其中，我將關鍵過渡(critical transition)以危機的概念替換，也在此過程中整理了許多近年來實驗科學中關於複雜性理論的研究發展，例如生態學、物理學、圖學等等，這些都是社會學平時不會接觸到的。我試圖藉由在關鍵過渡(theory of critical transitions)這個理論框架之下提出一個次理論，來為新型態的複雜現象提供解答：它們皆是在這個忽視的時代中，反覆出現且難以控制的巨大危機。■

來信寄至：
Aldo Mascareño
<amascareno@cepchile.cl>

> 拉丁美洲
新自由主義探究[1]

Verónica Gago，Universidad de Buenos Aires-UNSAM-CONICET，阿根廷

在《由下而上的新自由主義：巴洛克經濟與流行語用學》[2]一書中，我將深入新自由主義的概念，討論其如何影響理論辯題的發展、在這個地區有著怎樣的歷史脈絡，並追溯抗爭的起源；我也試圖挑戰那些認為新自由主義等於「市場」、相反於「國家干預」的想法。對這些辯論而言，參照拉丁美洲來描述後新自由主義的情境，也是很重要的一環。

我嘗試跳脫過去的新自由主義概念，亦即新自由主義是由上而下的一組政策，且是經過結構性的規劃。此外，我們應該要認知到，大眾對於抵抗、重構新自由主義帶來的剝削，已經做出了許多嘗試；我提出的「由下而上的新自由主義」概念，正反映出這點。我想要透過這樣的觀點，來挑戰對於新自由主義的整體解釋，以及那些以「底層主體成為最終受害者」的角度進行的分析。

我的研究焦點，會是新自由主義的連續性與不連續性如何在各方面作用。相比於政治體系的影響，這個問題背後涉及更加複雜的邏輯。我想藉由「巴洛克經濟體」一詞指出的，是飽和空間生產與平民倡議的時間、邏輯運作方式，已經逐漸過時。在研究中，我會以此概念來討論新自由主義的具體功能，並描述著名經濟體的政治結構如何形成；其中，本應是「受害者」的人又如何將政治結構中轉為抗爭場域，作為純粹商業計算準則的新自由主義理性（neoliberal reason），又怎麼被他們轉變、破除並重塑。

針對新自由主義的內部與外部抗爭，是以反對剝奪，以及反對經濟制度成為私人剝奪手段與新的價值開發形式為訴求。這些行動闡明了新自由主義在受到人們的詮釋與挪用下，呈現出自主性與服從性之間，相互衝突的龐雜性質。

如果新自由主義會受特定的抗爭循環影響，並減小其暴力的規模，那我們就必須更進一步討論。我們要如何理解新自由主義在形式上的持久性和重塑性，同時破解人們的迷思——新自由主義真的能夠藉由生命與資本的平等，消滅所有對立嗎？換句話說：新自由主義之中存在著怎樣的衝突，其又如何導致了新自由主義的變異？

> 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取逕

我最近的研究也持續以女性主義的角度分析新自由主義；這包含近期的兩本作品：與 Luci Cavallero 合著[3]的《女性主義視角下的債務》（A Feminist Reading of Debt）以及《La potencia feminista. O el deseo de cambiarlo todo.》[4]。在當代女性主義中，新自由主義一直是核心的特質，也因此成為其國際主義中的重要元素。這個論點是基於三個理由：首先，對於詮釋那些首次被理解為衝突的事件，以及釐清其中的關係來說，「分析」是其中的關鍵；其次，這讓我們在面對新自由主義如何轉譯、處理衝突的問題時，能透過多元文化主義視角，以及其能夠平息爭端的包容性質，對此議題辯論、提出挑戰。最後，這讓我們能評估在國際之間、尤其是拉丁美洲的案例中，崛起的保守勢力如何回應女性主義。

>>

「父權制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已經轉變，反映出全球對生殖勞動的更大依賴。但是為什麼新自由主義會發生這樣的變異呢？」

新自由主義的暴力引起結構性的調整與變動，並使得剝削與個體的生產密不可分；在吞噬一切的社會結構下，個體被迫待在危險的處境中，卻仍為了取得財富而奮鬥。前述的思考觀點，正好提供了一個解釋新自由主義暴力如何帶來影響的理論框架。

我主要討論四種暴力情境：(1)家庭內部的暴力，來自於男性養家角色的危機。男性因勞動市場中有著較高的地位，而取得了家庭中的特權地位，如今其權威卻逐漸消失。(2)新形式的暴力組織，由於非法經濟擴大、壟斷了其他的資源供應方式，而成為了民間社區的權威角色。(3)跨國公司透過侵占、掠奪公共土地和資源，剝奪其他經濟體的物質自主權。(4)各種形式的剝削和價值開發，促使社會生活金融化，更在債務工具的發達下成為日常。

將新自由主義與開發主義(extractivism)一同納入討論，對於從帝國層面理解新自由主義(在歐洲大西洋的觀點中，此點較少被討論)，以及釐清當前暴力的來源非常重要。

許多女性主義學者認為，父權體制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係不如以往，反映了全球對生育勞動的依賴更加龐大。這引發了另一個問題：新自由主義何以變異至此?

> 金融開發主義

我目前關注的問題，是金融化如何創造生產與再生產的新途徑。在拉丁美洲的經濟體內部、非工資經濟體與過去的非生產經濟體中，債務如何進行價值開發？為了解此議題，我們須將金融制度視為價值開發及推動性別議題進程的一種機制——或是說某種生產與生育間的關係。我們分析了這些債務如何利用了性別議題，並加劇日常生育的被殖民(Cavallero 和 Gago，2020)；同時也回應女性、女同性戀和跨性別女性在女性主義運動思潮中，對經濟自主權的訴求。考慮到科技的複雜性，以及其對於日常生活的影響，我們應該將金融理解為資本的開發邏輯，也正是這樣的內涵，構成了我們所說的「金融開發主義」。

在我的理解中，大眾、原住民、反對政府者、黑人、酷兒等特質也說明，為何女性主義運動善用集體的主體化，能成為抵抗新自由主義權力擴張與金融化無限烏托邦的關鍵要素。■

來信寄至：
Verónica Gago
<verogago76@gmail.com>

1. 由 Liz Mason-Deese 譯為英文。
2.2014年，由 Tinta Limón 於阿根廷出版；2015年由 Traficantes de Sueños 於西班牙出版；2017年在美國由杜克大學出版(Liz Mason-Deese 譯)；2018年，於玻利維亞由 Autodeterminación 評論出版，於巴西則由 Editora Elefante 出版(Igor Peres 譯)，並由 Raisons D'agir 於2020年在法國出版(Mila Ivanovic 譯)以刪減後的形式與其他論文一同發表。
3.2019年由羅莎盧森堡基金會在阿根廷出版；2020年，義大利語版本由 Ombre Corte (Nicolás Martino 譯)出版；英文版則於2021年由冥王星出版社出版(Liz Mason-Deese 譯)。
4. 2018年由 Tinta Limón 在阿根廷出版；2020年由 Editora Elefante (Igor Peres譯)於巴西出版；並分別由La Siniestra、Pez en el Árbol、Verso 在秘魯、墨西哥與美國，以《女性主義國際》為書名出版(Liz Mason-Deese 譯)。

> 邁向後自由語法

Carmen Ilizarbe，Pontificia Universidad Católica del Perú，秘魯

這次名為「Marcha de los Cuatro Suyos」的集會標志著藤森總統執政的結束。2000年，數千人聚集在秘魯街頭，抗議選舉舞弊，因此樹立了民主的強烈信號。
來源：創用CC。

自二十一世紀以來最重要的政治現象，莫過於人們對代議民主的自由主義式的理解(liberal understanding)出現嚴重的衰敗，甚至侵蝕。政治黨派的合法性危機正在世界各地發生，然而危機不僅於此。有關「代議制度是一種可運行的政治體制」的想法正出現危機，且很可能是無法回復的。考量到代議制的概念是所有當代民主政體制度設計的根據，代議制的形成更是與現代國家起初概念化的過程緊密相關。因此，至少自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來，我們便習慣於「權力可以同時被委派並維持著」的概念。「代」議制的謊言—假裝那些實際上在審議和決策過程中缺席的人們仍然藉由發聲權和投票權出席—是當代民主政體發展的根基。我在先前已主張，這個謊言已經崩壞，而代議制的根本概念(不僅是那些使其運作的關鍵制度和程序)也受到了影響。

> 有關「代議政治崩壞」的研究進程

回應政治中介制度的脫節，以及有鑒於統治者與人民間的斷裂，一種新的、政治上的自我代表(self-representation)形式出現，它繞開了政黨及其議程，也繞過代議體制下所規劃的制度管道。但是，政治場域並沒有被拋棄。在長達數十年的中期進程中，我們見證了社會的再政治化和人民主權的再次出現，有時它甚至能轉變成一股制憲的力量，正如智利的案例中所展現的。

在此脈絡下，可以將人民主權的多元形式看作是對政治

>>

的理解與建構現況出現重大改變的徵兆。因此，當中介失敗會如何？當代議機制不再如以往的運作會如何？當代議制的概念崩壞又會如何？這些都值得探討。我在接下來幾年的研究進程將關注與此過程相關的兩個動態：(1)因正式的代議制度的衰退或消失而出現的政治系統變化，及(2)會與國家相互動的不同自我代表形式及新政治主體的出現。

關於第一項研究，我對新興的反民主形式感興趣。威權主義的出(再)現、法西斯主義，甚至是極權主義政府近年來日趨可見，不論在自古以來代議民主發展困難的國家及地區(巴西作為拉丁美洲的代表案例)，抑或是在有堅實民主傳統的國家及地區(美國作為北半球的代表案例)。同樣的，那些最近在努力確立代議民主制度框架的國家，如秘魯、哥倫比亞、智利、玻利維亞、以及厄瓜多，也發展出違背弱勢群體的基本權利的反民主政府作為。如何解釋反民主的政府透過選舉當選的悖論？而這對民主的延續帶來什麼後果？什麼制度形式和機制確立了當今的威權規則？在威權主導的脈絡下又出現什麼樣的回應？今日的反民主情境背後的批判性分析有什麼樣的概念或理論基礎？

關於第二項研究，我感興趣於研究人民主權的概念如何形成並再次出現。綜觀南北、橫跨東西，我們見證到逐漸增長的多元社會運動力量，對帶來可見社會影響的經濟危機做出回應，也對缺乏手段的政治代議做出反饋。這些遠遠外溢出了既有的表達異見或不滿管道的群眾力量，是筋疲力竭的展現，卻也為由下而上的政治力量與計畫開啟了重新闡述的空間。這些形式的群眾再現有什麼樣的特徵？這是政治主體的憲法的新形式嗎？這為政治的民主化開啟了什麼樣的可能性？這又會多大程度、以什麼樣的方式幫助反民主政治的闡述呢？

> 超越自由主義語法的邊界

我接下來幾年的研究進程想瞭解國家—社會互動的動態，關注社會契約可能的革新形式，並超越由自由民主理論所發展的霸權概念架構。在主題上，這包含了對民主和民主化理論的批判，並且也同時背離社會運動理論，以更好地闡明這個社會—政治表達與參與的新形式的潛力。整體來說，這個計畫將同時包含發展新的分類方式與途徑，拋棄自由主義式的敘事方法，以更充分地理解正在發生的政治變革過程。■

來信寄至：
Carmen Ilizarbe
<cilizarbe@pucp.pe>

> 拉丁美洲的尺度、不平等及菁英

Mariana Heredia, Universidad Nacional de San Martín-CONICET，阿根廷

二十世紀阿根廷寡頭政治。

> 逐漸增加的關注與時下討論

當貧窮的比率持續不墜甚至增加、當龐大的財富被累積、當新的政治領袖出現造成制度緊張，菁英就再次地受到學術與大眾的關注。現在，他們成為不同、甚至對立的立場者批評的對象：有些人批評企業太貪婪，有些人批評政治無能。

在關於菁英的研究中，沒有任何學術創新跟著這波批評出現。在 Shamus Khan 對最新的文獻的評論中，他對這些「時髦」的討論提出警告。對菁英採取一個新的研究途徑所面臨的第一個挑戰是，在不同傳統中對此概念所使用的不同詞彙，菁英、上層階級、寡頭、統治階級、布爾喬亞、有錢人、優勢族群等皆是同義詞，彷若全都指向同一個概念。第二個挑戰是社會科學及其方法論途徑之間的分裂。

在許多學者與觀察家對於精英的研究中，他們強調自十八世紀末以來就被賦予這個群體的某些特質：有錢有權的人都是很有野心且少有顧慮的、他們的孩子繼承他們的位置但沒有繼承他們的「美德」、以及僅存在於特定團體中的交流。簡言之，面對史無前例的不平等，我們仍然著迷於上述的特徵，以及菁英與普羅大眾間的對比。工作與工人通常與歷史的關係較為密且：他們帶領主要的變革，或者，至少，這些變革是受到他們的影響。但是，資本、權力，及其主導者的再製似乎不為所動。

> 拉丁美洲的現實

社會理論—特別是在拉丁美洲所發展的—透過強調尺度的重要性，及探討菁英與當地社會的連結，提供對該區域不平等的洞見。拉丁美洲的實際情況對批判理論提出挑戰。由於該區域自殖民時期以來的受支配角色，戰略資源仍掌握在外國人或歐洲人後裔手中。單以國家的尺度不足以理解拉丁美洲的社會金字塔結構。同時，該地區大多數的國家都高度仰賴原物料的出口和剩餘勞動價值。

面對外國勢力強烈的影響，拉丁美洲菁英靈活的適應了時代的挑戰。首先是所謂的寡頭體制：他們施加新殖民主義秩序於國家領土上、壓迫原

>>

住民、與歐洲特使建立密切關係、並且建立阻礙大眾參與的政治制度。隨後，民族資產階級出現在最大的幾個國家中，通常伴隨著對民族運動與軍事政權的支持，該資產階級與都市和工業進步、大量勞動力的僱用，及促進國內生產與消費的政策十分相關。

基於這樣的傳統，可以看出近年對富人概念化方式的限制。Piketty 和 Oxfam 指出不平等日趨嚴重，並強調稅收作為一種創新的收入分配方式，而其他學者則強調，在當前資本主義的循環中，資本將更加流動且去殖民化。然而，至少在拉丁美洲，這些數據並不特別可靠，「有錢人」被證實是高度異質的，僅僅基於對富裕的譴責而產生的理論便非常不令人滿意。富人是五花八門的：富人世家與新貴、流動與非流動資產、依賴資源的與依賴勞動的、居住在該地區的與在國外積累財富的。因此，如果目標是要減少不平等，我們無法在薩爾瓦多和法國採取同樣的策略。拉丁美洲有很大一部份的財富並不掌握在拉丁美洲人手中，這些財富也不存在其境內。

> 克服對「富人」概念化的缺乏

要以更精確的觀點掌握拉丁美洲的菁英，有三個關鍵：具體指認出不平等、衡量不平等所適用的尺度，以及菁英所能獲得的資源類型。

最主要的經濟不平等與是否有能力進行（或暫停）能影響自然與社會的大型投資計畫有關。當前，大型投資機構與主導此區域的主要國際公司為這樣的不平等提供了全球的面向。當資本日趨流動且去個人化，經濟精英現已不再只包含生產工具的持有者、大型雇主，或當地的富裕階層：在多種領域耕耘的人，財經、法律、科技等領域的經營者和專業者，現在也參與到資本的管理當中。

相反的，最主要的社會不平等則是精英在住房、教育、醫療、文化的供給上享有的優勢，在社會關係上尤其嚴重，因為這種不平等並不會僅隨著財富的增長而等比例增加。當國家放棄提供普及化、高品質的服務的目標，權利成為商品，誰是菁英（成功的專業人員、高階公務員或中型企業主）就變得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這些社會精英享有其他公民沒有的機會。

最後，政治不平等取決於民眾動員、建立支持、以及發揮影響的能力。今日，經濟全球化與去中心化侵蝕了代議體制的制度性資源，許多政治人物會同時考量經濟利益。當認同導向的需求和差異提升，政府不得不向國外尋求資本，並建立包含了暴戾、機會主義的地方領袖的聯盟。

> 分散且隱晦的層級結構

指出經濟、社會、政治菁英的差異是重要的，儘管他們之間仍有連結。Michael Mann 著眼於區分「社會空間權力網絡」—任職期限有限的團體和機構所追求的權威—以及無形的權力，這種權力在沒有明確的核心或直接命令的情況下，透過去中心化的實踐而自發地擴展。領導者的權威說明了第一種權力（施加於...的權力），而市場自律或關稅慣性則說明了第二種權力（來自於...的權力）。這個新提出的觀點與 Albert Hirschman 的相似：他認為，全球化市場加強了商人放棄無利可圖領土的能力（叛離），多元的行動者以街頭抗爭或社群媒體表達不滿（抗議），但政權和公共政策所需要的忠誠與服從則被侵蝕了。

分析財富與權力顯然是降低不平等的重要任務。然而，財富與權力迷幻的吸引力與對其不分青紅皂白的的批評是同時存在的，兩者同樣的對社會共存帶來威脅，也都無法帶來進步。■

來信寄至：
Mariana Heredia
<mariana.heredia@conicet.gov.ar>

> 原始積累與法律批判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Rio de Janeiro State University，巴西

這是Diego Rivera(1929- 1945)在墨西哥城國民宮殿(Palacio Nacional)壁畫的一部分，描繪了西班牙對墨西哥的征服。

法律和資本主義的發展兩者之間有什麼樣的關聯呢？這個問題的標準回答範式通常是資本主義與民主兩者間的差異與摩擦。在這個範式中浮現兩種觀點：首先，可得的激勵資源不足以合法化國家對晚近資本主義的干預；其二，法律被認為是資本和權力積累的事實上限制—然而也只有當此積累釋放出許多導向普遍不同意的策略行動者時。兩者皆與 Jürgen Habermas 的理論中的規範基礎有關。

此範式的目的是為了將法律和民主視為一個整體的、對各種情境皆適用的原則， 好似法制民主的論述可以從其構成的物質利益中分離出來。藉由不承認法律作為當前分歧的一部份，上述答案忽略了連結積累與合法性的法律安排。當我們看到對晚近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問題的預測尚未被確認，這一點就更加清楚了。不只是新自由主義啟動了新的動力來源，金融資本主義及將其重新商品化的行動者也能用法律將其投機行為合法化。

> 法律形式

相對於資本主義/民主的標準範式，對法律形式的批評(由 Evgeny Pashukanis 提出)提供了以馬克思的價值理論來分析法律的想法。他的出發

>>

點是基於下述理解：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勞動的社會性承擔了價值形式。因此，具體的勞動被轉化為抽象的勞動，而其產品的價值形式則透過交換被轉化為社會秩序的一種必要條件。一旦不同勞動產品的交換形式統一，交換就可以在不相等的具體勞動形式中創造出抽象的平等—根據像是平均社會勞動時間這樣的標準，這讓社會不平等得以自我再製。且由於其價值形式的特徵影響人們的感知與行為，更達成拜物教的特性。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法律被視為與價值形式一起啟動的社會形式。它參與了不平等的具體勞動被抽象化的過程，藉由施加相等的交換規則作為商品交換的先決條件（如：等價交換等價物）。以此為目標的法律文書是自由與平等的根本原則，亦為「法律主體」。事實上，雖然這些文書創建了可以自由交換等價商品的抽象的平等主體，但是卻同時允許了私人利益與不平等的具體實行。以此而言，法制民主制度是一種讓市場關係和交換被具體化和迷戀化的社會形勢；也因此，他們使自己成為被迷戀的主體。

> 原始積累

對法律形式的批判創造出一個有解釋力的變項，可以用來分析法律在資本積累的（再）穩定機制中的位置，而非分析積累重新復甦的過程及持續成長的壓力。正如關於原始積累的馬克思相關討論中所確立的，資本主義社會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社會。從這個角度來看，資本主義的發展被視為，藉由商品化非商品的空間而不斷超越積累和成長極限的過程。這個過程是由無法在其原產地實現的總體剩餘價值以及過度積累的壓力所引起的，這需要徵收非商品化的區域以便完全的提取剩餘價值並分攤投資。

因此，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奠基於藉由重複的原始積累的不斷剝削，伴隨著「最下流的暴力」。這些行為應該被理解為直接暴力的形式（如：征服、搶劫和謀殺），在資本主義的發展中不是偶然，而是非常的頻繁。作為一種理論的刺激，原始積累和徵收的概念展現了法律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僅只是作為拜物教的社會形式，事實上，它還扮演了另外的角色。但我們該如何形容它？這是種什麼樣的暴力？是否有某種法律安排有助於資本主義的徵收？

> 原始積累的合法暴力

有別於對法律形式的批評，對原始積累的討論多著重在危機時期。根據David Harvey所說，在這些時期，資本的成長是由一股力量所驅動，這股力量藉由允許（再）商品化來進行時空調整，使資本的流動不受限制。干預危機不僅需要重新建構空間與時間維度，也需要創造對投資有益的環境。兩者皆具有多種法律結構（如：軟法、刑法、法律處分、警察暴力、戰爭……等）。它建立了一套複雜且動態的制度，既允許環境合理化（再）商品化，也允許用以剝削特定社會群體的暴力。

如同 Klaus Dörre 所主張，當今的經濟—生態雙重危機正藉由原始積累的觀點為當代診斷鋪路。這此診斷中，經濟—生態危機被解釋為使成長、繁榮和民主間的關係不穩固的因素。在此基礎上，法律和社會秩序的參與可以藉由考量積累的擴張壓力來分析，而這股力量是由此危機所觸發的。這個分析需要發展一個超越Habermas 的標準範式的批判法律社會學。另一方面，原始積累的持續使用證明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與所謂的等價交換原則中的剝削模式相關，也與藉由種族歧視、女性無償勞動和過度剝削移工勞動力的次級剝削所帶來的積累相關。當然，我們必須探問，是什麼法律模式（社會立法、警察行動等）促使了這樣的次級剝削。■

來信寄至：
Guilherme Leite Gonçalves
<guilherme.leite@uerj.br>

>《全球對話》波蘭團隊介紹

Jakub Barszczewski

Aleksandra Biernacka

Iwona Bojadżijew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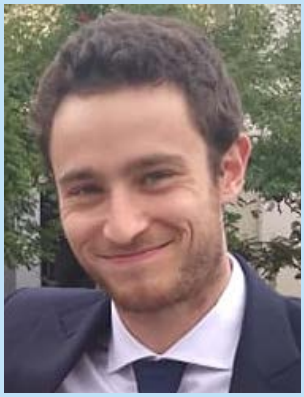
GLOBAL DIALOGUE

Sara Herczyńska

Justyna Kościńska

Adam Müller

Weronika Peek



Jonathan Scovil

Aleksandra Wagner

>>

Jakub Barszczewski 博士，現於 Bialystok 大學教授社會學。研究興趣包含批判理論、南方社會學、反殖民思想、反全球化霸權，以及創新性；博士論文則以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的反全球化霸權為主題。曾出版探討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中創新性論述的著作。

Aleksandra Biernacka 是社會研究研究所（GSSR）的博士候選人，就讀於波蘭科學院，社會學與哲學院文化理論系。現階段的研究方向，主要為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電影翻拍、翻譯理論、思想史、接收研究等。她擁有華沙大學的兩個文學碩士學位——波蘭語言學和美國文化研究。

Iwona Bojadżijewa 以社會學專業畢業於克拉科夫的雅蓋隆大學，目前正撰寫一篇與環境相關的博士論文。她也在非政府組織工作，為改善波蘭空氣品質奔走。

Sara Herczyńska 為華沙大學波蘭文化研究所的博士生，主要研究領域是記憶研究。她是大屠殺紀念研究小組成員，博士論文也以波蘭傳記博物館為主題。她同時也是 mała kultura współczesna 雜誌的編委會成員，以及扎切塔國家美術館的導游。

Justyna Kościńska 是華沙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其研究領域包括都市社會學、社會參與、社會階級和社會階層；博士論文則是關於公共服務的空間可及性。自2019年起，擔任全球對話波蘭編輯委員會的協調員。

Adam Müller 是一位量化研究人員，現於美國國家資訊處理研究所擔任助理。他擁有華沙大學社會學碩士和學士學位；目前研究興趣是高等教育部門的變化模式，以及自然語言處理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應用。

Weronika Peek 是華沙大學英語研究碩士研究生，對社會學有著深厚的興趣。研究旨趣包括認知語言學、概念隱喻、話語研究和女性主義文學批評。

Jonathan Scovil 為社會學博士生，就讀於華沙大學與社會科學高等學院（EHESS），並參加由法國政府獎學金資助的跨校博士計畫。研究興趣包含宗教與知識社會學、社會人類學和思想史。博士研究以法國和波蘭為例，探究歐洲對聖戰恐怖主義的看法。

Aleksandra Wagner 在華沙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研究所完成學士學位，並開始了碩士的求學生涯；研究興趣是家庭社會學、養育與婚姻。